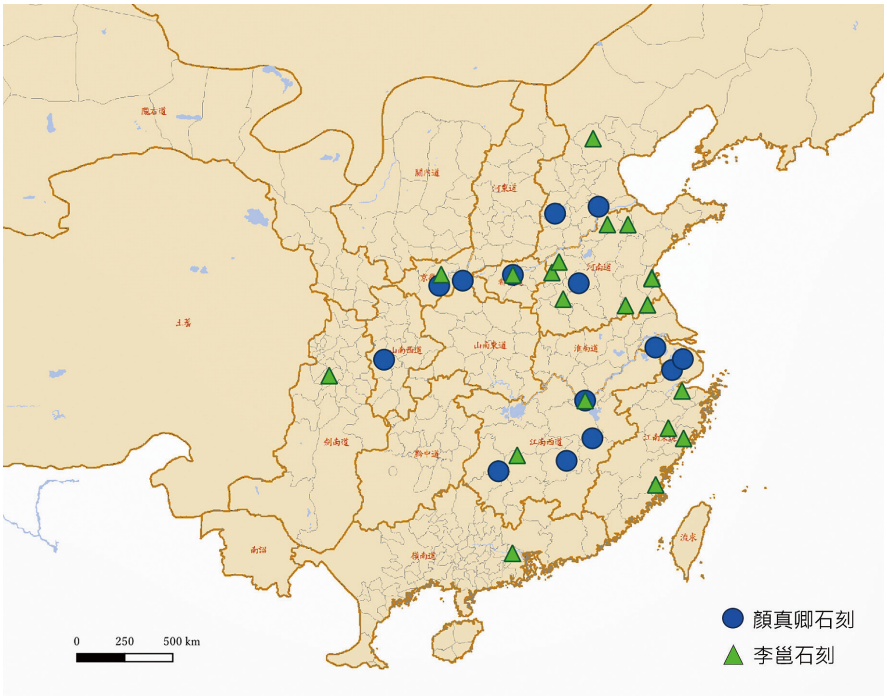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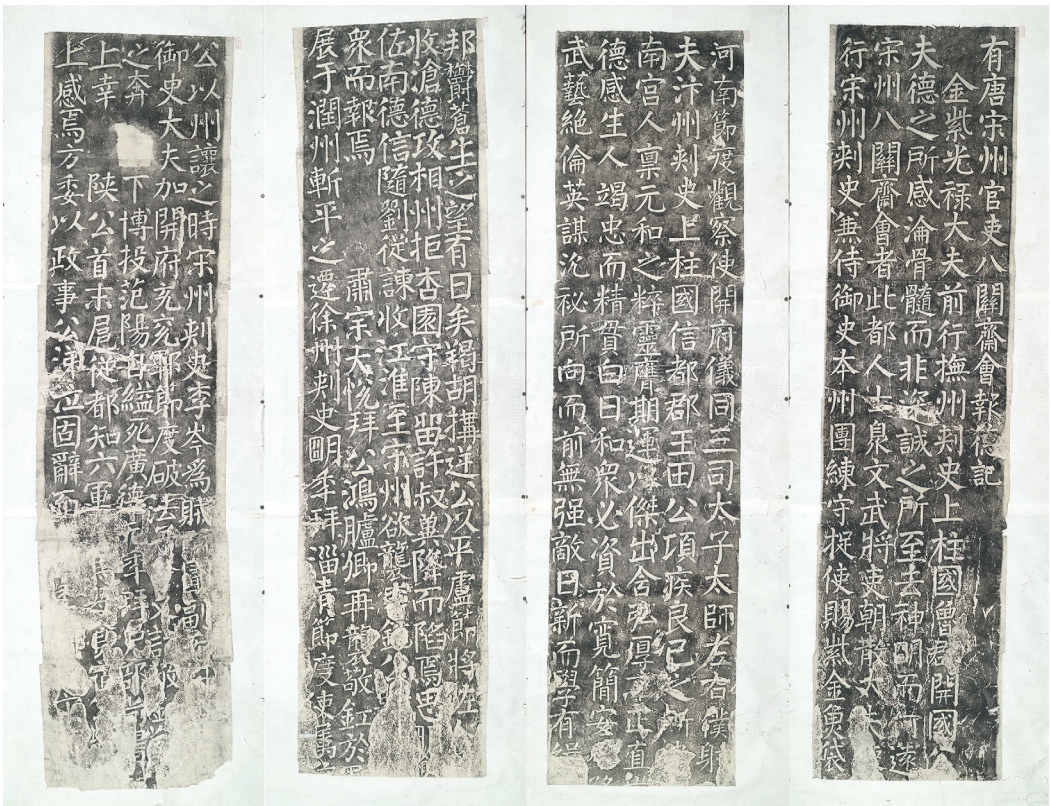


顏真卿現存石刻書迹分布（附李邕）



〈八關齋功德記〉拓本（局部）　臺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臺灣大學



〈修梁吳興太守柳惲西亭記〉殘石碑陰　浙江　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藏



〈修梁吳興太守柳惲西亭記〉碑陽（右）、碑陰（左）拓本

臺灣大

DOI: 10.6541/TJAH.202509_(59).0003

至必書石：顏真卿的宦遊石刻及其唐代命運

黃庭碩*

【摘要】在現今流傳的晉唐書迹中，顏真卿（709–785）作品無論從數量抑或分布均罕有人比，二項兼備者又當推魯公為最。顏書這兩大特色其實自北宋即然，其時不僅墨迹眾多，石刻書迹也甚可觀，從而引起眾金石學者注意。歐陽脩（1007–1072）主張，此因顏真卿有意使其字迹傳之長久，故多用「鉅書深刻」或「託於山崖」的書石方式留下遺蹟，故「今處處有之」。本文由此觀察出發，探究隱含其後的系列問題。首先，本文認為顏真卿所以能大範圍留下遺留石刻書迹，係以其豐富的地方「宦遊」經歷為基礎。顏真卿在逾二十年的宦遊生涯中，除常受到各方邀請書石，自己也積極想透過石質媒材讓字迹久存，是以其石刻創制脈絡不僅多重，且在書寫主題、書法表現和製作方法上都較此前有所拓展與創新。不過，顏真卿雖在生前留下大量宦遊石刻，這些作品在他過世後很快就遭遇嚴峻的存續挑戰，所幸中晚唐時已有一批欽慕魯公的有識之士，致力透過各種辦法搶救、恢復與傳承其作，令魯公石刻書迹得以保有相當規模留存至北宋乃至今日。本文以為，顏真卿的宦遊石刻創制不僅在石刻史上別具意義，其多樣化實踐亦足作為石刻研究的重要參照。

關鍵詞：顏真卿、石刻書迹、宦遊、石刻史

前言：從顏真卿書迹遺存特點談起

身為盛唐時期最負盛名的大書家，顏魯公真卿（709–785）作品之絕倫精采自不待言，但或許少有人留意，其作除蘊含著深為後世盛讚之美感價值，尚有一顯著特色，即留存數量要明顯多過絕大部分的唐代書家乃至其他名家前輩。以迄今堪稱徵集最多書法作品的近百冊套書《中國書法全集》為例，① 在進入「宋遼金編」的第32冊之前，只有魯公以一人之姿獨佔兩冊（25、26），並提供多達52件作品。這個數字不僅遠勝其他唐代書家，即便再往前推，也只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助研究員

① 劉正成主編，《中國書法全集》（北京：榮寶齋出版社，1991-200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有書法史上最著名的王羲之（303–361）、王獻之（344–386）父子檔足以當之——《中國書法全集》共收「二王」155件作品，並和其他留有傳世書作的王氏同門一同構成完整的兩冊（18、19）。然需指出，儘管純就作品數言，羲、獻父子要較魯公為多，實則兩人作品多屬短小型書簡，若改採所存字數計，恐還是無法超過留下逾十篇字數成百上千之長作的顏真卿。②

《中國書法全集》的統計當然不夠全面，③但已足以作為展示顏真卿書作在數量上之特出的風向標。饒富興味的是，這並不是一個純然當代的現象，早在北宋末，類似《中國書法全集》的情況就已出現。由北宋末年權相蔡京（1047–1126）幼子蔡絛所撰的《鐵圍山叢談》曾如此追述：

> 太上（徽宗）天縱雅尚，已著龍潛之時矣。及踐祥後，酷意訪求，自崇寧（1102–1106）始……至末年，上方所藏率舉千計，實熙朝盛事也。曩於宣和歲癸卯（1123），嘗得見其目，若唐人用硬黃臨二王帖至三千八百餘幅，顏魯公墨迹至八百餘幅，歐、虞、褚、薛及唐名臣李太白、白樂天等書不可勝會，獨兩晉人則有數矣。④

蔡絛在此特別標舉出「二王」與「顏魯公」的作品數量，顯然表示此乃宋徽宗（1082–1135，1100–1126在位）最致力蒐集的三大書家，至於後文用「不

② 本文所謂的顏真卿作品，係以《中國書法全集》和近年朱關田主編的《顏真卿書法全集（珍藏版）》（杭州：浙江攝影出版社，2019）中所列為準，而不涉及「本真性」的辨偽。近來有研究者主張傳世顏真卿楷書作品只有十件是「真蹟」，其餘都是後人仿造的「偽作」，見方令光，〈千祿之心、經世之書：顏真卿（709-785）楷書考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6）。不過由於本文重點不在分析顏書風格，更在於作為「物」的顏真卿部分石刻作品之創制脈絡、內容特色與中晚唐境遇，也因此即便是被當代學者懷疑為「偽」的顏作，只要能確認魯公有高機率創制過原件，本文仍納入討論，且將嘗試指出，即便是與顏書「真蹟」存有距離之作，亦有助理解顏書意涵及其如何被後人接受、傳世。

③ 若想對顏真卿乃至王羲之、王獻之的作品有更全面掌握，可參見朱關田主編，《顏真卿書法全集（珍藏版）》；江吟、宋行標主編，《王羲之書法全集》（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戴山青編，《王獻之書法全集》（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2）。

④ 蔡絛，《鐵圍山叢談》（叢書集成初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4，頁7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可勝會」一語帶過其他唐代名流，當只是用以形容其總體數量可觀，個別說來未必要超過顏真卿，至於僅存「有數」的兩晉作品自然更不用說。⑤ 以上所言還僅是內府所藏墨跡，若加上各地留存的石刻書迹，則顏書數量甚至要直逼二王，畢竟活躍於北宋中葉的朱長文（1039–1098）就曾宣稱，在他寓目的「碑刻遺跡」裡，「存者最多」的就是魯公書石作品！⑥

凡此均顯示，顏書體量之出眾實有長久淵源。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得讓顏真卿留下遠過他人的作品數呢？書法史學者朱關田曾提出一個有意思的解釋。他主張，作為一代「忠臣和書家」的顏真卿，其「書迹具有文物、文獻、書法藝術三重價值」，因此格外為「歷代統治階級和收藏家所重視」，並舉宋徽宗的內府收藏作為證明。⑦ 此說無疑具有相當的解釋力，且讓我們很快聯想起另則著例，也就是對顏真卿書法作品在南宋以降之流傳發揮巨大貢獻的《忠義堂帖》。如所周知，此帖編者留元剛正是顏真卿的熱情崇拜者，特別利用自己出知魯公後人遷居的溫州之便，廣泛徵求顏真卿作品，不僅成功尋得宋敏求（1019–1079）所編《顏魯公文集》十二卷殘本，還將未收入其中的文獻另編為《補遺》與《附錄》，此外更為之作《年譜》，

⑤ 蔡絛的追憶數字可能只是針對當時內府所收的最寬鬆統計，事實上，早於蔡絛回憶時點前幾年編成的《宣和書譜》（1120年成書）所列出的內府相關收藏數字就遠遠不及——王羲之作品243件、王獻之作品89件、顏真卿作品28件，見佚名撰，范紅娟點校，《宣和書譜》（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1），頁31-32、155-164。對此，清代四庫館臣主張《宣和書譜》「著於錄者」已經過一番「精為汰簡」之過程，是以「魚目之混罕矣」。換言之，他們認為蔡絛所舉數字當包含許多可疑之作，不若《宣和書譜》精確。見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卷112，〈子部．藝術類一，宣和畫譜〉，頁2338。不過即便僅就收錄數量遠低於蔡絛所稱的《宣和書譜》論，顏真卿作品數量仍是五代以前僅次於「二王」的存在。

⑥ 朱長文纂輯，何立民點校，《墨池編》（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卷9，〈品藻四．續書斷．神品三人〉，頁276。朱長文此論斷可在南宋初纂成的《金石錄》中得到呼應，在此書收錄的宋初以前石刻裡，魯公作品數量確實勇冠唐代以前書家。據筆者的不完全統計，《金石錄》收有50餘件魯公作品，居於其後的是柳公權的40餘件、李邕的30餘件。見趙明誠撰，金文明校證，《金石錄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19）。

⑦ 朱關田，〈顏真卿書法藝術及其影響〉，收入氏著，《唐代書法考評》（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1992），頁1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並將陸續蒐得的魯公書迹匯刻成《忠義堂帖》。⑧惟此帖之蒐羅顯然不全以藝術審美為目的，此可證之於留元剛處理〈自書告身〉的做法——儘管不少人疑心此作出自顏真卿子姪輩之手，他依然以「英風誼氣，千載不磨，所以興起人心，為世所重者。要之，不專以字畫論也」為由將之納入，⑨足見是帖尚兼有文物、文獻保存之價值。⑩

然應提醒，後人之熱心蒐羅，固於顏真卿書迹的大量傳世貢獻厥偉，但所以能成就如此偉業，還有一不容忽視之前提：魯公確實遺留下為數出眾的書迹，從而讓收藏者更有機會徵集到多於其他書家的作品。事實上，對宋代金石蒐藏風氣具有重大開拓之功的歐陽脩（1007–1072）即曾在其著名的《集古錄跋尾》說到：

> 顏魯公……忠義之節，明若日月，而堅若金石，自可以光後世、傳無窮，不待其書然後不朽。然公所至必有遺蹟，故今處處有之。唐人筆蹟見於今者，惟公最多。視其鉅書深刻，或託於山崖，其用意未嘗不為無窮計也。⑪

這段話有幾個重點：首先，歐陽脩指出顏真卿的忠貞節操，已足以光耀後世、傳之無窮，實無須書迹為其增色，儘管如此，就他目力所及，北宋中葉所能見到的存世唐人筆跡，仍要以魯公作品最多；其次，歐陽脩指出此現象實源自顏真卿的個人能動選擇，即「所至必有遺跡」，從而造就出「處處有之」的結果；第三，歐陽修進一步揭示其時所見的顏真卿書迹，多係以「鉅

⑧ 潘猛补，〈《忠義堂帖》與溫州——兼論〈自書告身〉真偽〉，《圖書館雜志》，2014年2期，頁105-108、25。留元剛對《顏魯公文集》殘本的增補，見陳振孫著，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錄題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16，頁471。

⑨ 留元剛，〈刻顏氏告跋〉，收入黃本驥輯，《顏魯公集》（四部備要本，上海：中華書局，1936，據三長物齋叢書本校刊影印），卷18，頁2。

⑩ 關於《忠義堂帖》對顏真卿書法作品的保存與傳播之功，參見朱天曙、程玉兒，〈《忠義堂帖》與顏真卿書風在南宋的傳播〉，《書法教育》，2021年6期，頁58-66；莊子薇，〈從《忠義堂帖》看顏真卿於南宋之形象〉（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

⑪ 歐陽脩，《集古錄跋尾》，收入《歷代碑誌叢書》，第1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據清槐廬叢書本影印），卷8，〈唐湖州石記〉，頁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書深刻，或託於山崖」的碑版或摩崖等「石刻」型態出現，⑫顯示魯公本人很有意識要通過石質媒材的耐久特性，讓鐫刻於上的一己字跡得有更高機會「傳之無窮」。

歐陽脩這段話極具啟發，倘其觀察無誤，或許可以說，顏真卿的傳世書迹所以得在數量上如此突出，乃是先天優勢加上後天經營之成果：先天部分在於，魯公自始就要比其他書家更有意識地在其行經之地留下其字跡，且在擇選媒材時積極採用較紙張更不易損毀的石材作為載體，遂令其作不僅要較同代人來得既多且廣，還擁有更高的留存機會；後天部分則源自其響亮的忠義名聲，讓蒙其感召的後人更願意去主動保護、流通其作。兩相交織，終促成魯公書迹數量在整個晉唐時代居然僅次於鼎鼎大名的「二王」這一事實。

惟在此同時，歐陽脩的論斷也進一步開啟幾個關於魯公書作的疑問，比方稱其「所至必有遺蹟，故今處處有之」，就值得深入玩味。僅就今日所知的魯公書作分布，誠可發現其作分布範圍甚廣，除唐碑最集中的兩京，諸如山東、浙江、江西、湖南、四川等地都有留存，符合「處處有之」的評價，不過，能夠如此大範圍地留下傳世書迹，在宋代以前其實是相當罕見的現象，唯一可與之匹敵的，大概只有時代略早一些的李邕（675–747）。⑬（兩人作品分布參見圖1）這背後緣由，顯然很難僅用顏真卿較其他書家更熱切想要留存一己書迹輕易解釋。再者，假若顏真卿果真較同代人更渴望讓自己的書迹傳於後世，是以常以「鉅書深刻，或託於山崖」方式，使之形於石質媒材，那這是否意味顏真卿的「石刻」作品蘊藏著一些相較此前更為特別的創制脈絡、情境，與內容，得讓我們從中掘發出更多屬於魯公個人的獨有色彩？又，當我們意識到歐陽脩的觀察，距離顏真卿作品創制當下少說已間隔

⑫ 本文所謂的「石刻」，特指專門造來承載與展示文字的石質載體，其種類多樣，諸如摩崖、碑、碣、墓誌等皆屬之，此定義主要參考趙超，《中國古代石刻概論（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23）。惟本文沒有直接套用趙著鉅細靡遺的分類，而僅從製造者角度，按其鐫刻載體之形制概略分為「碑版」、「柱幢」及「摩崖」。

⑬ 杜甫（712–770）曾以「碑版照四裔」稱頌李邕，見杜甫著，謝思煒校注，《杜甫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卷7，〈贈祕書監江夏李公邕〉，頁1092-1093。李邕生卒年考證，見朱關田，〈李邕小傳（附：年譜簡表）〉，收入氏著，《唐代書法考評》，頁65、86-8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兩百多年之久，就應認知到魯公書迹要能以「處處有之」狀態傳入北宋，定非理所當然，而是業已歷經保存與維護，若然，宋以前人是怎樣看待、處理顏真卿在各地遺留下的石刻書迹，自也成為值得追索的問題。

惜管見所及，由歐陽脩評論觸發的以上疑問，迄今均未獲得足夠關注，遂決定試加探索，並提供一點個人淺見。在進入具體分析前，筆者擬對本文的主要取徑與架構進行扼要說明。首先，本文將採過往顏書研究較少見的制度史進路，探究魯公所以能在唐帝國境內大範圍留下石刻作品之前提，筆者主張，此現象相當程度奠基在唐代精英官僚的遷貶制度設計，復加上顏真卿在職場上的犯顏特質，方令他得以在京城以外之地積累起豐富異常的「宦遊」經歷，遂有機會在過程中廣布其作。解明此疑後，接著把焦點轉移到顏真卿於「宦遊」途中製成的石刻作品，設法通觀其創制因由、書寫內容，及形式樣態，再嘗試從石刻學脈絡把握其特色。最後納入「物」的視角，考察顏真卿宦遊石刻在中晚唐的經歷與命運。藉由這四層次的分析，本文希望能為構成顏真卿現存作品大宗的宦遊石刻，其生成脈絡、內容特色與傳世機緣提供更為深刻的把握與理解。

一、顏真卿石刻「處處有之」的制度基礎

本節從歐陽脩針對顏真卿石刻作品所下的「處處有之」論斷談起。前文已說到，在有唐以前書家裡，顏真卿作品分布之廣泛堪稱數一數二，其中又以石刻作品為多。因此若欲探詢顏真卿何以能較絕大部分同代及前輩書家在更多且廣的地點留下石刻作品，首先應設法回答，魯公何以有機會進行如此長距離且大範圍的移動。當我們有此意識，再回過頭省視魯公石刻書迹，就會很容易發現，這些作品有很高比例產自其「宦遊」階段。

所謂「宦遊」，即「因宦而遊」，係唐代極為顯著的精英官僚文化風景。之所以需要「因宦而遊」，源自李唐朝廷承繼隋代「廢鄉官」後流內官均由中央統一除授的「本籍迴避」政策，遂使所有流內官除落籍兩京者，基本失去在本籍州縣任官之機會，而需定期接受中央銓選調遣，以決定要在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服務，或外調地方，至任滿再返回京城參與新一度的銓選，接受新的委任。⑭在此情況下，「因宦而遊」遂成為唐代流內官員普遍的生命體驗。⑮應當提醒，經常伴隨宦遊而來的大範圍或長距離移動，在唐代其實並不平常，因為有唐政府對於勞動人口的人身控管甚嚴，平民百姓要想離開所屬州縣，前往他地，定得向在籍與沿途地方政府申請「過所」或「公驗」等許可，方能遂行；⑯與此相對的，許多唐代精英官員反因宦遊制度的推動，非自願地從事大範圍或長距離移動——任至高宦的顏真卿正是如此，此可清楚徵之於魯公的畢生仕宦經歷。⑰

出身北朝名族瑯琊臨沂顏氏的顏真卿，生於景龍三年（709）長安，雖幼年喪父，然在母親殷氏家族的悉心奧援下，仍順利成長為學品兼優的青年。開元二十二年（734），年僅二十六歲的顏真卿成功考取進士第，獲得任官資格，接著又在二十四年（736）應吏部「平判入等」科考試獲評高等，得授祕書省校書郎，自此步入仕途。天寶元年（742），顏真卿再應制舉，登文詞秀逸科，被擢為京兆醴泉縣尉。而後穩步攀升，歷任長安縣尉、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武部員外郎等職，至天寶十二載（753）方因不附當朝權貴楊國忠（700–756），被出為平原太守。兩年之後，安史之亂爆發後，顏真卿在河北抵抗年餘，期間因守城被加官戶部侍郎，然終決定棄城前往鳳翔詣唐肅宗（711–762，756–762在位）行在，而獲偏安朝廷授以正三品高官憲部尚書。至德二載（757）十月，已改任御史大夫的顏真卿扈從肅宗返回長安，然還來

⑭ 關於「廢鄉官」與伴隨而來的「本籍迴避制」，參見濱口重國，〈所謂、隋の鄉官廢止に就いて〉，收入氏著，《秦漢隋唐史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6），頁770-786；呂慎華，〈唐代任官籍貫迴避制度初步研究〉，《中興史學》，5期（1999），頁33-47。

⑮ 由於唐代精英官員多有長距離往返各地任職之需要，遂使其經濟生活、家庭形態，乃至生命經驗均受此文化影響，相關研究見甘懷真，〈唐代官人的宦遊生活——以經濟生活為中心〉，《第二屆唐代文化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學生書局，1995），頁39-60；胡雲薇，〈千里宦遊成底事，每年風景是他鄉——試論唐代的宦遊與家庭〉，《臺大歷史學報》，41期（2008），頁65-107；鄭雅如，〈「中央化」之後——唐代范陽盧氏大房寶素系的居住形態與遷移〉，《早期中國史研究》，2卷2期（2010），頁1-65。

⑯ 更細緻的討論見程喜霖，《唐代過所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0）。

⑰ 以下整理主要根據朱關田，《顏真卿年譜》（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嚴杰，《顏真卿評傳》（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顏真卿簡譜〉，頁320-32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及一展長才，旋因忤旨於同年底被外調為同州刺史。以此次外放為起點，顏真卿進入了幾乎被「宦遊」佔去泰半的後半生。

魯公抵達陝西同州僅數月，即在至德三年（758）先後被轉調至山西蒲州和江西饒州。儘管不久他就在至德四年（759）六月蒙恩轉除昇州刺史充浙西道觀察使，復在隔年（760）年初重新受徵入朝任刑部侍郎，不料沒幾個月，顏真卿又再次得罪宰相李輔國（704–762），遭出為蓬州長史（760.8–762.5）。寶應元年（762）五月，魯公轉調利州，卻因羌民圍城不得入而被召回長安。這次他總算在朝中待了較長一段時間，期間歷任戶、吏兩部侍郎、尚書右丞、刑部尚書，還獲封為魯郡公——此即「魯公」稱號由來。惜好景不常，魯公又在永泰二年（766）二月因論太廟祭器不修，被與其有隙的宰相元載（713–777）以誹謗朝廷罪名外放。他這次整整在地方輾轉了十一年，歷任吉州司馬、撫州刺史、湖州刺史，直到大曆十二年（777）三月元載被誅，才被徵還朝廷。此時魯公已年屆七十，深受朝廷敬重，也因此接連獲授刑部侍郎、吏部尚書等高位，乃至太子少師、太師諸殊榮，然他終不改耿直性格，以致在建中四年（783）被嫉恨他的宰相盧杞（？–785）刻意遣至許州宣慰領導兵變的淮西節度使李希烈（？–786），最後遭借刀害死。

從以上簡述可以看到，魯公一生屢被外派地方，遂有機會積累起豐厚的宦遊地方經驗。在此認識基礎上，再來檢核顏真卿的石刻作品創制地點，我們旋即會發現，其中有極高比例都是他在履職各地時所造。為方便後文討論，以下先把魯公的完整仕宦履歷，及其在宦遊過程留下的主要石刻製表列出：

表1　顏真卿仕宦經歷與宦遊石刻

no	職任	品秩	起任	相關作品 （書迹仍存者標以「存」）
1	祕書省校書郎	正九上	開元廿四年（736）春–開元二十六年（738）	
2	醴泉縣尉	從八下	天寶元年（742）九月–	張蘊仁德政碑
3	長安縣尉	從八下	天寶五年（746）四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4	監察御史	正八上	天寶六載（747）	
	充河西、隴西軍試復屯交兵使	—	天寶七載（748）八月	
	充河東、朔方軍試復屯交兵使	—	天寶八載（749）春	
5	殿中侍御史	從七上	天寶八載（749）八月	
	洛陽都畿採訪處置使判官	—	天寶九載（750）春	
6	侍御史	從六下	天寶九載（750）十二月	
7	兵部/武部員外郎⑱	從六上	天寶十載（751）春	
8	平原太守	從三（上州）	天寶十二載（753）六月	紀顏氏三典茲郡碑、紀同時臺省擢牧諸郡碑、漢太中大夫東方朔畫贊並碑陰記（存）
9	戶部侍郎（平原任上加官）	正四下	天寶十五載（756）正月	
10	憲部尚書	正三	至德二載（757）四月	
11	御史大夫	正三	至德二載（757）五月	
	歸長安	—	至德二載（757）年底	
12	同州刺史	從三（上州）	至德二載（757）年底	
13	蒲州刺史	從三（上州）	至德三載（758）三–十月	馬承光碑、請御書逍遙樓碑額表
	經華山、洛陽、江州赴饒			華山廟題名（存）
14	饒州刺史	從三（上州）	乾元二年（759）年初	

⑱ 天寶十一載三月改兵部為武部，見劉昫撰，《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卷9，〈玄宗本紀下〉，頁22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5	昇州刺史充浙西節度使	從三（上州）	乾元二年（759）六月	
16	刑部侍郎	從四	乾元三年（760）正月	
	經新政縣赴蓬	—		鮮于氏離堆記（存）
17	蓬州長史	正六下（下州）	乾元三年（760）八月	
18	利州刺史（未赴）	正四下（下州）	寶應元年（762）五月，未赴入朝	
	歸長安	—	寶應元年（762）十一月	
19	戶部侍郎	正四下	寶應元年（762）十二月	
20	吏部侍郎	正四上	寶應二年（763）三月	
21	尚書右丞	正四下	寶應二年（763）十月	
	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		廣德元年（764）正月	
22	刑部尚書	正三	永泰元（765）正月	
23	硤州別駕（未赴）	從五（下州）	永泰二年（766）二月，旬餘改吉州別駕	
	經荊州、江州至吉州	—		東林寺題名（殘存）、西林寺題名
24	吉州別駕	從四下（上州）	永泰二年（766）二月	鮮于仲通碑、靖居寺題名（存）、祖關二字
25	撫州刺史	正四上（中州）	大曆三年（768）五月	橋仙觀碑記、魏夫人仙壇碑、華姑仙壇碑、寶應寺翻經臺記、顏允南/喬卿/幼輿/允臧碑、徐秀神道碑、書馬伏波語（存）、殷踐猷/殷攝墓碣、張景倩清德碑、元子哲遺愛碑、千金陂記、臧懷格碑（存）、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

	經上元、廣德、湖州、蘇州至潤州掃祖墳，再北上赴京	—	大曆六年（771）八月–大曆七年（772）十一月	麻姑山仙壇記（存）、大唐中興頌（存）、涇縣碑、寧國題名、刻清遠道士詩（存）、顏含大宗碑、顏含碑、書李白誌公像贊、玄武湖記、玄妙觀老君贊、顏默碑、八關齋會報德記（存）、開元寺僧碑、宋璟碑（存）
26	湖州刺史	從三（上州）	大曆八年（773）正月–大曆十二年（777）八月	文殊師利菩薩碑、沈氏述祖德碑陰記、干祿字書（存）、重書天下放生池（存）、杼山妙喜寺碑、乞御書題額恩敕批答碑陰記（存）、顏杲卿神道碑、橫山廟碑、歐陽使君神道碑、康希銑神道碑、修梁吳興太守柳惲西亭記（存）、射堂記、項王碑陰述、李玄靖碑（存）、湖州石柱記、謝公碑陰記
	溯江西上，經江州、洛陽返京	—	大曆十二年（777）九月–十一月	祖亭之碑、殷夫人墓誌（存）
27	刑部尚書	正三	大曆十二年（777）十一月⑲	
28	吏部尚書	正三	大曆十三年（778）八月	

⑲ 魯公實際獲除刑部尚書，是在大曆十二年（777）八月底的湖州刺史任上，他大概隨後就啟程返京，至十一月，他即以刑部尚書身分進獻在湖州編成的《韻海鏡源》予朝廷，因此筆者推斷他大概在是月正式上任，參見朱關田，《顏真卿年譜》，頁317、3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9	太子少師	從二	建中元年（780）八月	
30	太子太師	從一	建中三年（782）八月	
	赴許州宣慰 李希烈	—	建中四年（783）正月–貞元元年（785）正月	

上表有幾處需加說明。首先，筆者在職任「欄位」主要列出的，是魯公歷任的「職事官」，而非所有頭銜。唐代官銜構成複雜，就精英文官言，常見有爵號、勳官、散官、職事官、使職五部分：爵號乃朝廷賜予的特恩榮賞，如顏真卿的「魯郡公」號即然；勳官本為軍功所設，然因濫授而大幅貶值，淪為政治實質意涵有限的頭銜；散官代表官場上的資歷與位階，故亦有「階官」之稱；至於實際職任則多體現在「職事官」。⑳ 換言之，個別文官的升遷黜降，及要留在朝廷供職抑或前往地方服務，基本是由「職事官」決定，是以經由「職事官」的串聯，即可對個別文官的宦海浮沉及宦遊路徑擁有大致把握。這是上表擇其作為「職任」欄主要內容之故，至於右邊欄的「品秩」所紀錄者，亦是「職事官」之官品。

另要補充，約自八世紀初起，唐代朝廷越發常讓部分文官去承擔一些與本職無關的臨時性差遣，這些差遣或會掛上具有代理意涵的「檢校」，㉑ 或掛「某某使」頭銜，後者即所謂「使職」，在唐中葉以降愈加氾濫，不僅深刻左右唐代後期的官制運作，㉒ 也連帶影響許多文官的生命經驗——特別是促成許多本職之外的「宦遊」機會。以顏真卿為例，其最早幾次「宦遊」就是在監察御史任上，以「使」臣身分出差到河西、隴右、河東、朔方等地；

⑳ 張國剛，《唐代官制》（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頁160-170；王壽南，〈唐代文官任用制度之研究〉，收入氏著，《唐代政治史論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頁138-141。

㉑ 此類具有實際職務的檢校官主要集中在唐前期，至唐後期則漸淪為虛銜，見賴瑞和，〈論唐代的檢校官制〉，《漢學研究》，24卷1期（2006），頁175-208。

㉒ 一個主要影響就是「使職」漸取代「職事官」成為官員主要職任，致讓許多「職事官」失去原先職能，出現「階官化」傾向。參見張國剛，〈唐代階官與唐代職事官的階官化〉，收入氏著，《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論集》（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頁207-23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另導致他命喪淮西的代朝宣慰，大抵即「宣慰使」類使職。有鑑於此，上表也把具有實際職任的臨時性差遣一併列出，以求更完整地重構魯公仕宦軌跡。惟在職任計次上，筆者仍以「職事官」為準，是以即便列出臨時性差遣，也僅以附從方式隨列在「職事官」後。

另方面，「宦遊」既是由「宦」與「遊」兩大部分構成，自不應只關注代表「宦＝職任」的所在，也需把常隨轉職而來的「遊＝移動」同時納入考察。此類移動有很多種情況，如從中央調至地方，或從某地調至另地，又或者在地方任職到一半被朝廷重新召回京城，以及在地方任滿重新返京參加銓選。事實上，這些狀況在顏真卿的畢生宦途中都曾出現，而與本文至為相關的，是筆者發現在顏真卿石刻作品中有許多並非製作於任所，而是在魯公轉赴新任職途中所造。因此筆者特意將曾遺留下見錄作品的魯公轉任旅程一併登錄上表。

在此整理基礎上，本表進一步透過不同底色區別顏真卿的京城和地方經歷，更具體的說，維持白底欄位即表示係顏真卿供職京城之時，灰底欄位則為活動於各地（包含行在）的階段，其中既包含任職期間的「宦」，也包含轉職之際的「遊」。據此粗略統計，魯公的整個宦遊時間合計超過二十年之久，佔據其官宦生涯的五分之二，若從他在753年被出為平原太守算起，其後半生則有三分之二時間處於宦遊。㉓ 而也正因為顏真卿的豐富宦遊經驗，使他能夠廣泛地在唐帝國境內移動，進而得在諸多地方留下石刻作品——上表將顏真卿在宦遊過程中完成的重要石刻盡可能列出，藉以說明，這正是魯公所以能如此大範圍地在唐境各處留下石刻書迹的制度性基礎！

前面提到書迹分布範圍可比美顏真卿的李邕，實際上也多是通過宦遊留下其作，是以儘管留存數量不及魯公，仍足以佐證本文論點。但問題還未徹底解決。因為前面說到，在力行「本籍迴避制度」的有唐一代，「宦遊」實為精英文官的常見經歷，那麼理論上，精英文官理當享有近似的制度條件，

㉓ 據氣賀澤保規統計，自顏真卿任平原太守後，他在外期間約22年，相對的在中央僅約10年，見其〈新発見唐代顔真卿撰書「西亭記碑」の理解とその歴史的意義〉，收入氏編，《論集 隋唐仏教社会とその周辺》（東京：汲古書院，2023），頁312，表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得讓他們輾轉各地，既然如此，為何只有顏真卿、李邕寥寥數人能成就此事？對此疑問，筆者仍想先從制度史角度提供一點理解線索。

還是先以顏真卿為例進行說明。和一般的唐代文官相較，魯公職涯有兩個特出之處：一是獲授職事官數量可觀，高達30個，即便扣掉沒有真正上任的利州刺史和硤州別駕，仍有28個；二是在履職的28任職事官中，有13任係在京城以外諸州，㉔ 累計時間近二十五年，構成魯公既豐且長的「宦遊」經歷。而這兩個現象其實不易同時出現在一介文官身上。對唐代文官制度做過通盤研究的賴瑞和指出，絕大部分唐代文官畢生可實際出任的職官常就是三到五個，㉕ 因為當時的遷轉制度規定，倘若所任職官的品位不夠高或不夠美——更具體的說，即六品以下「非常參官」與「非供奉官」——任職前後基本都要「守選」，即待職一至十二年不等（卑官多選，高官少選），方能重新參與吏部銓選。在此制度規範下，職任之間的間距自要被拉長，也連帶限制了畢生所能擔任的職官數目。㉖

至於像顏真卿這樣累宦達30任者，已是唐代官僚中的精英級別成就。㉗ 魯公所以能夠如此，與其宦途前期發展之順遂有關。前已說到，魯公乃進士出身，對盛唐士人來說，這是極其成功的起步，因為自八世紀初開始，以文章、文采作為錄取標準的進士科就越來越受到朝廷重視，致令進士出身者在高級官僚中的比重逐步攀升，進士第也因此多被視為美好宦途前景之保障。㉘ 惟在唐代，考中進士只是取得「出身＝任官資格」，無法馬上任職，而得先

㉔ 長安縣乃構成長安城的其中一縣（另一為萬年縣），本文不歸入與京城相對的地方。見劉昫撰，《舊唐書》，卷38，〈關內道．京師〉，頁1394。

㉕ 賴瑞和，《唐代中層文官》（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14-15。

㉖ 關於「守選」制度，及得享「不守選」優待之職官，見王勛成，《唐代銓選與文學》（北京：中華書局，2021），頁128-170。王書指出，「守選」基本上針對是六品以下職事官，不過其中有少數職官可享豁免優待，即「六品以下常參官與供奉官」，諸如各司的員外郎、補闕、拾遺、監察御史、太常博士等。值得注意，上舉職官除了屬於禮官的太常博士性質較特殊，其他多為唐代精英士人的理想暨常任職官，見賴瑞和，《唐代中層文官》，頁20-37。

㉗ 賴瑞和主張，「歷官二十任左右是唐代士人任官的理想，可視為他們仕途是否騰達的一個標準」，見氏著，《唐代中層文官》，頁15。

㉘ 吳宗國，《唐代科舉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頁150-15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經為期三年的守選，才能至吏部參與例行性「冬集」銓選，進而獲得授官，㉙但唐代朝廷顯然也考慮到這項辦法將對少數俊秀之士的職涯造成不必要的滯礙，特意設計出兩條得以繞過守選的應試授官管道，即吏部定期舉辦的「科目選」，及皇帝不定期召開的「制舉」。

吏部「科目選」可說是銓選制度中的特別選，年年舉辦，但限制具有「出身」者和已任官者參與，又分作幾個不同應試科別，然以「平判入等」、「博學宏詞」和「書判拔萃」三科最重要；與此相較，由皇帝親自召開的「制舉」則向包含白衣的所有人開放，只是時間與考試內容均不一定。儘管有上述差異，此二管道仍有一大共通點，就是中第者均可直接獲得授官，㉚這對原需守選者來說無異為不次拔擢，自然深有吸引力。有此認識，再來重觀顏真卿的早期宦途，就會發現他相當成功地利用這兩項管道加速其仕宦：魯公的起家官祕書省校書郎，就是他在考取進士第後兩年（736）參與吏部科目選的「平判入等」考試獲判高等後所授，㉛有效縮短了原本要求的三年守選期；738年，魯公母親殷氏病逝，他因此離職守喪，待三年服滿，他復以「前資官」身分預與742年的制科考試，並在登第後得授醴泉縣縣尉，由此再次縮短了轉任時間。㉜

不僅如此，顏真卿在轉仕第三任職官長安縣尉、第四任職官監察御史之前，亦都沒有經歷守選。前者是因為，他在746年尚於醴泉縣尉任上時，即獲時任關內道採訪使王鉷（？–752）奏薦，而被拔擢為長安縣尉。「奏薦」儘管不是考試，但作用和「科目選」、「制舉」有點類似，都是作為一般銓選管道的補充，用來加速優秀人才的升遷，魯公也因此在極短時間內獲得第三

㉙ 王勛成，《唐代銓選與文學》，頁61-72。

㉚ 關於科目選與制舉的詳細說明，見吳宗國，《唐代科舉制度研究》，頁60-102；王勛成，《唐代銓選與文學》，頁280-372。

㉛ 關於「平判入等」科，見金瑩坤、于瑞，〈唐代吏部平判入等科與選舉研究〉，《學術月刊》，2014年11期，頁141-153。

㉜ 按「六品以下的非常參官與非供奉官」需守選、且「卑官多選」的原則，位階至高僅有正九品上的校書郎理當守選，且時間可能逾三年。儘管賴瑞和曾據一些史料懷疑校書郎是否需要守選，但也如他指出唐人的仕宦資料經常不全，有時很難判斷某些無縫轉職的具體情境，見氏著，《唐代基層文官》（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288-28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任職官。或許由於表現出色，魯公甫任長安縣尉年餘，旋又被擢為御史臺監察御史。此次遷轉於顏真卿的宦途意義重大。監察御史雖僅是八品官，卻不歸吏部銓注，而例由皇帝敕授，屬於六品以下「常參官」，得享「不守選」之優待。㉝ 自此以降，魯公就再不用受到守選制度約束，得以無縫轉任新職——這對一位步入宦場甫十年的青年官僚而言，無疑大有利於畢生任職數的累積。

顏真卿前期宦途之順遂，還不只體現在升遷之速，更重要的是，他的前幾任職官均屬當世士人極為欽羨的美官。年紀略小於魯公的封演，曾在其《封氏聞見記》提出時人公認的理想文官升遷途徑，依次是①進士出身或制策登第、②校書郎或正字、③畿縣縣尉、④監察御史或殿中侍御史、⑤拾遺或補闕、⑥員外郎或郎中、⑦中書舍人或給事中、⑧中書侍郎或中書令，是謂「宦途八俊」，㉞ 對照魯公直到第七任職事官武部員外郎之前的仕宦，可以發現他基本就是按照這條途徑升遷（①②③④⑥），且甚至可說是最理想情況：以其首任的祕書省校書郎言，實乃校書郎群體中品秩最高者，達正九品上，被後人譽為「文士起家之良選」；而他通過「制舉」獲授的醴泉縣尉，及經「薦舉」獲授的長安縣尉，在品秩上均屬高於畿縣縣尉的赤縣縣尉。㉟ 是以若就魯公宦途前期發展看來，他應該很有機會繼續往「宦途八俊」的末兩階段邁進才是。

然而，顏真卿的宦途卻在其第七任上步向歧途。性格剛烈的魯公，於任武部員外郎時得罪了權臣楊國忠，因而在753年被外調為平原太守（治所在今天的山東省德州市平原縣）。此次調遣對魯公宦途可謂重大打擊，儘管純論官品，他在京擔任的武部員外郎為從六品上，赴任的平原則因屬上郡，太守

㉝ 關於監察御史於唐代文官升遷之意義，見賴瑞和，《唐代中層文官》，頁49-92。

㉞ 封演撰，趙貞信校注，《封氏聞見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5），卷3，〈制科〉，頁18-19。這段話被許多研究唐代官制的學者引用，相關分析可見賴瑞和，《唐代中層文官》，頁23-31；劉后濱，〈宦途八俊：中晚唐精英的仕宦認同及其制度路徑〉，《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56卷6期（2019），頁93-103。

㉟ 賴瑞和曾對校書郎與縣尉做過精細研究，見氏著，《唐代基層文官》，頁13-69、99-15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級秩達到從三品，㊱乍看宛如升遷，但就當時的政治脈絡，所有人都明確知道此乃帶有示警意味的貶謫。事實上，整個唐前期的官僚選任普遍存在著重內官（中央官）、輕外官（地方官）之傾向，致使士人亦以內官為榮、不樂外任，㊲在此氛圍下，將官員從內官轉調為外官就成為一種貶謫手段。顏真卿的外調平原正是如此。㊳而後魯公雖因在安史亂間有功朝廷，重被提拔為「內官」，然他復由於耿直性格幾度觸怒執政而屢遭外貶，終促成其異常多任且漫長的地方「宦遊」經驗。

要言之，儘管「宦遊」乃唐代文官常見經歷，然要如顏真卿這樣擁有既多且長的地方「宦遊」經驗，大抵要有兩個前提，一是畢生得累積足夠多的職任數量，二是所任需有相當比例屬於外於京城的「外官」，此二條件湊合在一起，就指向一種文官類型，即：既屬於文官中的精英（前提一），然宦途卻又存在巨大波折，以致有長時間無法留在文官最嚮往的京城（前提二）——本文主角顏真卿正是如此，至如留存書迹範圍可相比擬的李邕亦然。㊴以上討論，為我們理解顏真卿（乃至李邕）何以能如此大範圍地留下書迹

㊱唐代州郡官員品秩按所領州郡等級而有別，上郡太守（後改州刺史）為從三品、別駕從四品下、長史從五品上、司馬從五品下；中郡太守（州刺史）為正四品上、別駕正五品下、長史正六品上、司馬正六品下；下郡太守（州刺史）為正四品下、別駕從五品上、司馬從六品上，見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30，〈上州中州下州官吏〉，頁745-747。

㊲相關研究頗豐，可參考劉詩平的綜理與討論，見其〈唐代前後期內外官地位的變化——以刺史遷轉途徑爲中心〉，《唐研究》，2期，頁325-345。

㊳日本學者辻正博即把顏真卿的此次外調視為「貶官」，見其〈唐代貶官考〉，《東方學報》，63期（1991），頁334。

㊴李邕宦途多舛，他在長安四年（704）受到文壇泰斗李嶠舉薦，以左拾遺入仕，然兩年後（706）尋坐與遭整肅的張柬之（625–706）善，被出為南和令，尋貶常州司戶參軍；景龍元年（710）被召還京城，歷左臺侍御史、戶部員外郎，然隔年（711）又捲入政爭被外放崖州舍城縣丞，後轉江州別駕；開元三年（715）入為戶部郎中，旋得罪宰臣姚崇（651–721），於716年再出為括州司馬；之後李邕累遷渝、海、陳諸州刺史，然復於726年因受贓罪左遷欽州遵化縣尉；爾後約二十年，他又歷任澧州司馬、括州刺史、淄州刺史、靈昌（滑州）太守、汲郡太守、北海太守，最後在北海任上遭政治牽連被杖殺。見朱關田，〈李邕小傳（附：年譜簡表）〉，頁36-87。由以上整理，可以清楚看到李邕畢生雖也累積相當官宦，但有逾三十年時間都在京城之外宦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提供了制度面基礎，然需指出，儘管整個唐代能同時符合前述二條件者的數量有限，加總起來仍頗有一些，㊵ 是以從制度角度著眼，至多僅能解答顏書「處處有之」現象之部分，若想擁有更通透的把握，勢必還得將顏真卿的個人獨有特質，尤其是他對寫字及刻石的高度熱情一併納入考慮才行。下節就把焦點轉至這個面向。

二、顏真卿宦遊石刻的創制脈絡解析

前文說到，「宦遊」是唐人進行大範圍移動的重要動力，特別是像顏真卿這樣在宦途上頗歷坎坷的高級官僚，更容易因為朝廷的貶謫外放，反覆在京城與各地之間遷徙移轉。這對當事者肯定不好受，卻也因此提供難得機會，讓他們得以踏上意外旅途，進而觀覽許多過去未見的地方風光。此種經驗難免要觸發這些文官的個人感悟，因此他們常會運用最嫻熟的文化技藝，亦即文字書寫來回應其處境。已有不少學者指出，唐代宦遊很大程度拓展了詩文創作的體裁與內涵，比如被派往西北者開始創作出大量邊塞詩、被貶至南方者則深化了山水文學，及以地方風土作為主要記述主題的采風式作品，㊶ 又或是各類寄寓京城懷想的流貶詩歌等，㊷ 因而有目共睹地推動了唐代文學發展。

㊵ 特別是隨著安史亂後地方藩鎮大開，使得在各地擔任幕僚官甚或節度觀察使的機會大增後，擁有宦遊各地經驗者也越來越多，甚至開始有士人因為部分「外官」俸祿高過「內官」，而主動追求外仕，但應指出，對於多數士人來說，此類仕宦仍只是返回京城出任高官的跳板，因此若非宦途不順，一般不會像顏真卿那樣在各地流連這麼久的時光。見李燕捷，〈唐代後期內外官輕重辨〉，《社會科學戰線》，1992年4期，頁162-167；石雲濤，《唐代幕府制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482-489。

㊶ 論見何寄澎，《總是玉關情：唐代邊塞詩初探》（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8），頁24-30；戶崎哲彥，《唐代嶺南文學與石刻考》（北京：中華書局，2014），頁1-17；廖宜方，《唐代的歷史記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1），頁373-430。

㊷ 尚永亮，《唐五代逐臣與貶謫文學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關於唐代流貶官員的複雜心理及京城情結，可參見李建崑，〈論唐代元和時期流貶文人之行旅詩〉，《文史學報》，29期（1999），頁27-48；甘懷真，〈漢唐間的京城社會與士大夫文化〉，收入邱仲麟編，《中國史新論：生活與文化分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頁192-19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過，相較創作於宦遊過程中的大量詩文，能同時留下較多書法作品的唐代文官就要有限許多，這一方面當然和書迹不若文本容易留存與傳續有關，但另方面，也應該意識到在整個唐代，有機會透過書石、書碑來增加自己書迹傳世機會的文官，肯定要比從事詩文創作者稀寡，畢竟書石、書碑不若詩文創作可以純然自發、頻繁且隨時地進行，而多係在特殊場合應邀而寫，也因此能受青睞者往往屬於擁有善書令譽的小部分人。以李邕為例，史稱其「早擅才名，尤長碑頌」，雖長流在外，許多中朝衣冠與各方寺觀仍「多齎持金帛，往求其文」，所製前後累積達數百首，㊸ 此固與李邕被推為當世文豪有關，但他的「書中仙手」美譽無疑也大有俾於受邀。㊹

顏真卿生長於善書家族，自小就受家學影響勤勉練習，㊺ 雖曾自謙字「不能佳」，㊻ 但從他至遲在三十三歲即受邀撰書〈王琳墓誌〉㊼ 看來，其善書名當早在青壯年時代就已奠定。㊽ 年至四十之後，魯公也愈加頻繁地獲

㊸ 歐陽脩、宋祁撰，《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卷140，〈文苑中・李邕傳〉，頁5043。

㊹ 李邕文章曾和獲贊為「大手筆」的張說同被時人許為當世第一，見封演撰，趙貞信校注，《封氏聞見記校注》，卷3，〈銓曹〉，頁22。「書中仙手」據《宣和書譜》出自李陽冰的讚嘆，同書又云李邕「文章、書翰俱重於時」，故「當時奉金帛而求邕書，前後所受巨萬餘，自古未有如此之盛者也」，卷8，頁94。此求書數字或有誇大，仍足證李邕的文書俱美乃是他不斷受邀書石寫碑之因。

㊺ 顏真卿自幼習書，見殷亮，〈顏魯公行狀〉，收入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514，頁5224。事實上，不只顏家有悠長的書學傳統，顏真卿母系長輩殷仲容（633–703）亦是初唐書法大家，見吉川忠夫，《顏真卿伝：時事はただ天のみぞ知る》（京都：法藏館，2019），頁20-26。

㊻ 魯公〈草篆帖〉自云：「真卿自南朝來，上祖多以草隸篆籀爲當代所稱，及至小子斯道大喪，但曾見張旭長史頗示少糟粕，自悵無分，遂不能佳耳。」見黃本驥輯，《顏魯公集》，卷4，〈草篆帖〉，頁7。

㊼ 王琳墓誌是2009年出土自洛陽的新出顏碑，也是目前所能見到的最早顏真卿作品，對瞭解魯公早期書風意義重大，見王木鐸，〈新出土顏真卿早期書作《王琳墓志》及其意義〉，《中國書法》，2005年8期，頁61-68。

㊽ 不少書法史家根據北宋以前書論幾無言及顏書之段落，推論顏真卿在唐代並不以書法聞名，然應指出，書論本就只是少數人基於較高創作標準所進行的評判，不僅門檻較嚴，還常帶有個人偏好，所以即便是常受邀撰碑的「善書」者也未必就能廁身其間。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邀書石，如晚近出土的〈郭虛己墓誌〉（750），被視作早期顏書代表的〈多寶塔碑〉（752），都是這時候的作品，也因此自魯公在757年進入反覆且漫長的宦遊階段後，他就經常在途中或任所接獲各方的書石邀約，遂得在許多地方留下石刻書跡。儘管從現存文獻看來，顏真卿的受邀頻率大概不及李邕，但他卻有個迥異於李邕的特點，就是格外主動地去創造石刻作品，從而大幅提高其書跡在各方的能見度。

根據朱關田研究，目前傳世可考且較可信的顏真卿著錄書迹約有140件，在這裡頭，產生自魯公漫長宦遊生涯的石刻作品約有65件，[49] 近總體的四成七，占比甚為可觀。這裡所謂的魯公「宦遊石刻」，係指他撰作於自京外調地方的途中、或在外地任所，又或從外地返回京城路上的作品，是以純就撰作地言，這些作品不僅產自其宦地，亦包含行經路途；至於實際坐落地就更複雜，因為其中有相當比例係魯公在宦遊過程中應他方友朋邀請所寫，是以最終立石所在常跟魯公行蹤脫鉤。不過於此想指出一個值得特別關注的現象：就筆者粗略統計，以上這些宦遊石刻屬於魯公被動應邀而作的僅約18件，反觀屬於主動撰作的至少有43件！[50] 此構成與「多為酬請而作」的李邕石刻相當不同，[51] 也因此得以有效拉近兩人所造刻石的數量與分布。

以下透過一些具體事例來展現顏真卿宦遊石刻的豐富創制脈絡。就魯公五十歲以前的遺存作品看來，其早期宦遊石刻大抵造於任所，如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著錄〈張蘊仁德政碑〉，就是他在天寶初（742）任醴泉縣尉時書

另方面，現存中晚唐文獻仍不乏稱許魯公書法者，如懷素〈自敘帖〉即言「顏刑部書家者流，精極筆法」，見「故宮典藏資料檢索」，網址為https://digitalarchive.npm.gov.tw/Collection/Detail/14901?dep=P（檢索日期：2025年3月8日）。後文也將提到其他中晚唐人讚揚及學習顏書之例，足證魯公書法在唐代已有一定的名聲與市場。

[49] 見文末表3〈顏真卿宦遊石刻總表〉。該表主要根據朱關田所編《顏真卿書法全集（珍藏版）》中的作品總目錄、〈顏真卿書迹著錄考略〉，及《顏真卿年譜》提及之作品整理而成。又，此數字已剔除一些被認為明顯為後世偽托（如〈扶風孔子廟堂碑〉）、誤繫（如〈顏氏六告〉），或來源可疑（如〈泰山提名〉）等作品，若全部加入，總數將達到170件左右。

[50] 參見文末表3〈顏真卿宦遊石刻總表〉。

[51] 此評語見徐海容，《唐代碑志文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8），頁15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造，據趙明誠《金石錄》，是碑完整題名為〈周醴泉縣令張仁蘊德政碑〉，原造於武周長壽三年（694），相傳魯公赴任時碑已漫漶，遂「重書而刻之」。[52] 而後，魯公在平原太守任上（753–757）亦造有三碑，最著名者即為當前仍有拓本傳世的〈東方朔畫贊並碑陰記〉（圖2），另兩碑則僅能略知內容，一「紀同時臺省擢牧諸郡者十餘人」，另一「紀顏氏曹魏時顏裴、高齊時顏之推俱為平原太守，至真卿凡三典茲郡」。[53] 再來就是他在758年蒲州任上時所書的〈馬承光碑〉，此碑碑主在安史亂間鎮守蒲州，屢退敵軍，甚有功於朝廷，似在魯公赴任蒲州前後過世，遂有人撰文紀念，並邀得善書且為繼任者的魯公為之書碑；[54] 似乎同樣在這一年，刑部尚書王璵（？–768）欲鐫刻玄宗所撰〈登逍遙樓詩〉，特上表奏請肅宗御書碑額，事成後復邀請魯公正書其〈請御書表〉，以求增添此碑之色。[55]

---

[52] 趙明誠撰，金文明校證，《金石錄校證》，卷4，〈目錄四．第七百七十二〉，頁76；卷25，〈跋尾十五〉，頁473-474。

[53] 封演撰，趙貞信校注，《封氏聞見記校注》，卷10，〈修復〉，頁93。

[54] 馬承光主掌蒲州的確切時間在至德二載（757），即魯公前任。參郁賢皓，《唐刺史考全編》（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卷79，〈河東道．蒲州〉，頁1124。

[55] 關於〈請御書表〉的書寫時間存有異說。歐陽脩子歐陽棐編纂的《集古錄目》載此碑資訊為「蒲州刺史王璵以詩刻石，請御書；碑額表一，蒲州刺史顏真卿書；答詔，肅宗書。乾元元年立」，然王璵在乾元元年（758）仍為刑部尚書，要至乾元二年七月才出為蒲州刺史充蒲、同、絳三州節度使，據此或可認為王璵的蒲州刺史銜乃是追記；麻煩的是，南宋編成的《寶刻類編》稱此碑立於河中（蒲州），若然，似又像是王璵任蒲州時請御書，但是時顏真卿早不在蒲州任上，結銜又不當是「蒲州刺史」，分見歐陽棐，《集古錄目》，收入《歷代碑誌叢書》，第1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據清槐廬叢書本影印），卷7，〈唐．玄宗登逍遙樓詩〉，頁9；佚名，《寶刻類編》，收入《歷代碑誌叢書》，第1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據粵雅堂叢書本影印），卷2，〈名臣十三之一．顏真卿．刻逍遙樓詩請御書碑額表〉，頁16。對此，朱關田提出兩個推測，一是《集古錄目》所載的「乾元元年立」當為「乾元三年立」之訛，那也就意味顏真卿書此表文時人不在蒲州；另個可能是王璵係在刑部尚書任上請御書並獲准，於是請到當時任蒲州刺史顏真卿重書，但未及樹碑就被外調，只好在蒲州任上才立。見朱關田，《顏真卿年譜》，頁144。筆者認為後一推斷較好解釋《叢編》同時將王璵、顏真卿載為「蒲州刺史」的疑問；下文也會看到魯公後來也有奏請肅宗御書成功，卻拖延數年才立碑的例子，因此本文更傾向後一推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任所內書石、造碑，可說是唐代宦遊石刻的最重要生產機制，顏真卿無疑也承繼此主流風氣，然相較多屬被動受邀的同代人，顏真卿打從開始就帶有高度的主動性——平原三碑的創制就是顯例，後文還會再說到——也因如此，待魯公轉調到以產石聞名的撫州、湖州後，他即進入宦遊石刻創制的最高峰。不過我們更應注意，自顏真卿由蒲州轉調至饒州起，他就開始在宦遊途中留下越來越多石刻，且和任所情況一樣，除被動受邀外，主動創制之作也比比皆是。目前所能見到最早作於宦遊途中的石刻著錄，是他在758年從蒲州調往饒州途中，參謁華山時留下的〈華山廟題名〉（又名〈謁金天王神祠題記〉，圖3）；而後是魯公在760年自刑部尚書被貶為蓬州長史，途經閬州時巧遇與顏氏頗有通家之好的成都兵曹鮮于昱，經夕相談、頗生感懷，遂援筆撰書頌揚其父鮮于仲通（693–755）的〈鮮于氏離堆記〉；[56] 再來就是766年，他自京城赴任江西吉州別駕路上，造訪位在廬山的著名東、西林寺，從而留下的〈東、西林寺題名〉。

至於現在所能見到此類產生自宦遊途中的魯公石刻，最密集出現在其於大曆六年（771）閏三月任滿撫州刺史，及至隔年年末返回京城重新參與銓選而獲授湖州刺史新命的一年多間。此趟赴選所以花費如此長時間，首先是因為魯公任滿後，似為等待朝廷正式頒給令其「停替」的「魚書」到來，並未馬上離州。[57] 正是在此空檔，魯公先於四月撰書並刊刻了著名的〈麻姑山仙壇記〉（圖4），而後又在六月前應人在永州的好友元結（723–772）之邀，[58] 書成〈大唐中興頌〉（圖5）寄去。[59] 魯公或在六、七月時離開撫州，因為從其

---

[56] 雖然《顏真卿年譜》認為此文是應鮮于昱之邀所撰（見朱關田，《顏真卿年譜》，頁143），但觀魯公於內文稱其與鮮于昱「留遊締歡，信宿陘峴」，乃「感今懷昔，遂援翰而誌之」，主動書寫的可能性似更高。惟此文之上石已在兩年後，基本上與顏真卿無關。

[57] 說見朱關田，《顏真卿年譜》，頁203。唐代「刺史停替，須待魚書」，見陸贄著，王素點校，《陸贄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卷2，〈制誥．冬至大禮大赦制〉，頁63。

[58] 據楊承祖研究，元結在前一年（770）即返回永州浯溪守制，見氏著，〈元結年譜〉，《淡江學報》，2期（1963），頁59。

[59] 學者目前多據現存文獻未載魯公到過永州，推斷魯公當是書成後寄去，惟究竟是誰安排上石，仍有不同看法，朱關田以為是當時的州牧王庭璬，楊承祖、薛龍春則認為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訊庫

他文章可知，八月時他人已在潤州上元（今江蘇南京）一帶，[60] 而要從撫州至潤州，自鄱陽湖循江東下乃當時最便捷的路線，也正是在必經的宣州（今安徽宣城），魯公留下〈涇縣碑〉與〈寧國題名〉兩件著錄刻石。或有讀者感到好奇，魯公離任後若要返京，最便捷的走法應是沿江西上，自荊、襄溯漢水至白河河谷，再北入長安所在的渭河平原，[61] 何以反其道而行地往江南走呢？

這是因為，顏真卿並沒有直接回京，反是先至位於潤州白水的顏氏先祖墓地逗留一段時日，好好整頓灑掃一番才北返，而他的一項翻新措施，就是重新在祖塋書石立碑，遂有大曆六年十一月的〈顏含大宗碑〉，以及大曆七年（772）四月〈顏含碑〉之作。[62] 在此前後，魯公也順道遊覽不少江南勝地，因此分別在蘇州及金陵留下〈刻清遠道士詩〉、〈書李白誌公像贊〉、〈玄武湖記〉等作。魯公或在大曆七年的四、五月之交離開潤州北上，因為可以確定五月時他已抵達宋州（今河南商丘），而在此前，他曾道經十四代祖顏默終官的潁州（今安徽阜陽），並在此書立〈顏默碑〉；在宋州，魯公則受到當地刺史力請，書就今日仍可見到拓本的〈八關齋會報德記〉（圖6）。接著，魯公繼續西行，先在汴州留下〈開元寺僧碑〉，並在九月行至洛

是元結，分見朱關田，〈顏真卿書迹著錄考略〉，收入氏著，《顏真卿書法全集（珍藏版）》（杭州：浙江攝影出版社，2019），第8卷，頁162；楊承祖，〈元結年譜〉，頁60；薛龍春，〈名稱、書寫及環境所塑造的風格——圍繞浙大藏顏真卿殘碑的三個問題〉，《中國書法》，11期（2020），頁128。順帶一提，〈大唐中興頌〉是魯公石刻中唯一的左行書寫作品，過去曾有學者爭辯這是否為有意之舉，但假若此作確係由他人委託工匠摩勒上石，則左行也未必就是魯公本人設計。相關討論可見楊化坤，〈元結撰、顏真卿書〈大唐中興頌〉碑主旨新探〉，《東吳中文學報》，38期（2019），頁23-35。又，近來有學者根據與元結相關的一些浯溪石刻（即〈大唐中興頌〉所在），係以一右行、一左行的相互對稱方式鐫刻，推測〈大唐中興頌〉可能是要與方位上與其相對然為右行的〈東崖銘〉搭配成組，才採左行上石，或可備一說，見江伯威、陳鍇生，〈中國古代左行書迹考論——兼議顏真卿《大唐中興頌》〉，《中國書法》，2025年6期，頁194-196。

[60] 魯公自言其撫州刺史任「（大曆）六年閏三月代到，秋八月至上元」，見黃本驥輯，《顏魯公集》，卷5，〈乞御書題額恩敕批答碑陰記〉，頁13。

[61] 吳修安，〈唐宋時期南北交通幹道新探——江西區域視角的考察〉，《國學研究》，45卷（2021），頁63-85。

[62] 前者是顏真卿親撰並書，後者則是重書前人李闡撰、顏延之銘的舊文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陽時，親書近兩年前於撫州就已奉邀撰成的〈宋璟碑〉，並在同月底樹立於位在邢州沙田的宋璟墓前。十一月，魯公結束宦遊抵京，在等待年底銓選的稍前空檔，他先為遷柩回長安祖塋的伯父顏元孫撰書墓碑，獲得新授的「湖州刺史」後，復於十一月二十六日受請為年初遘疾離世的好友元結撰書碑表——惟顏元孫及元結碑均作於京城，本文暫排除於「宦遊碑刻」範疇。大概在此不久，魯公即動身啟程，並在隔年（773）年初抵達新任所湖州。

單就以上整理顏真卿自卸任撫州，至其返回長安前所造的宦遊石刻，即有13件之譜，且其中逾半都屬魯公主動書造，清楚展現出其能動性。事實上，在魯公留下最多宦遊石刻的撫州和湖州，均呈現出類似構成，可謂是魯公有別於此前書碑名家的一大特點。不僅如此，本文還想進一步指出，魯公如此主動且熱衷地書造，實在相當程度上引領了石刻內容的拓寬與創新，於石刻的物質文化意義帶來了不容小覷的影響。

關於石刻內容的歷史變化，其實是個關注有限卻值得深究的問題。儘管研究金石學或石刻學的學者多曾對內容進行分類，然不僅類別不一，且絕少將這些大類置於時間發展維度中考察。管見所及，日本學者戶崎哲彥是少數做過此嘗試的學者，他利用楊殿珣編輯的《石刻題跋索引》所分七大分類：①墓碑、②墓誌、③刻經、④造像、⑤題名題字、⑥詩詞、⑦雜刻，扼要指出石刻內容發展大勢，即前四大類（①②③④）要比後三大類（⑤⑥⑦）流行時間為早，並主張此現象反映石刻內容「從紀錄事件本身擴大到了紀錄感想的方面」，某種程度亦可說是從「史學擴大到了文學」。[63] 戶崎氏的觀察，對理解顏真卿宦遊石刻之意義極有幫助，尤其是當我們把其主、被動製作因素考量進去時，就會發現魯公被動的受邀之作，多屬於傳統常見的述德、敘功、記事類等碑、誌大宗，但在主動創制時，就常溢出此範圍，出現諸如題名題字、詩詞、雜刻等戶崎氏認為較晚出的大類作品。[64]

而當意識到魯公以前絕少有人主動創制宦遊石刻此一事實，就會赫然發現，顏真卿很可能不只是石刻內容擴大趨勢的縮影，甚至根本就是開啟變化

[63] 戶崎哲彥，《唐代嶺南文學與石刻考》，頁28。

[64] 楊殿珣在題名題字、詩詞、雜刻三大類中均有列出顏真卿作品，見其《石刻題跋索引》（北京：商務印書館，194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風氣的先導型人物。一個有力旁證是：魯公遺留石刻在內容類型的廣度上基本可說前無古人。不妨以最早嘗試對石刻內容進行分類的北宋朱長文《墨池編》為例，在其針對截至當時徵集數量最眾的唐碑所作的十種分類（墓銘、讚述、佛家、道家、祠廟、宮宇、山水、題名、藝文、傳模）中，唯有顏真卿作品遍及所有，且除最後「傳模」一類係由後人根據墨跡本重新上石外，前九種均係顏真卿在世時所造，足見他於擴大石刻內容上的開先，更重要的是，《墨池編》所舉前九項均包含本文最關切的「宦遊石刻」，恰可顯示「宦遊」於魯公石刻創制的重要性！[65]

惟本文以為，既有石刻分類終非為顏真卿量身訂做，無法充分體現其宦遊石刻的特色面向，遂在吸納前賢成果後，重將魯公石刻分為：「敘政」、「敘人」、「親族」、「記事」、「佛教」、「道教」、「地方勝蹟」、「旅遊題名」、「旅遊題字」「藝文」等十大主題，次節前半也將由此入手，嘗試彰顯魯公宦遊石刻的特性。不過在此同時，仍要提醒利用石刻既是以石質媒材來乘載與展示文本，無疑與唐代最常見的「傳於口、書於紙」方式，[66]在製作與傳播程序上皆存在著重大不同。

一般說來，要將文字移轉到石質媒材上的方法大抵有二，一是讓書者直接書丹，二是書者先把字寫成墨本，再由專業工匠勾勒上石，至於其呈現形態主要集中在碑版、柱幢和摩崖三類。過去不少學者認為唐代書家在題寫碑版時多直接書丹，唯要鐫刻在形制較特殊的多面式或圓柱式柱幢，[67]或特製為摩崖，或應遠方友人邀請書石時，才會先寫成墨本——這在魯公宦遊碑刻中皆可見到，石幢如書立於宋州的〈八關齋會報德記〉，摩崖則如遙寄給元結後鐫刻於浯溪崖壁上的〈大唐中興頌〉。然晚近有學者通過文獻及新出

---

[65] 朱長文纂輯，何立民點校，《墨池編》，卷17、18，〈唐碑上〉、〈唐碑下〉，頁551-621。

[66] 關於唐代的這兩種文本傳播方式，見Christopher M. B. *Nugent, Manifest in Words, Written on Paper: Producing and Circulating Poetry in Tang Dynasty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67] 〈八關齋會報德記〉刻在佛教石幢中最常見的八角形棱柱之上，另也有少數呈四面、六面或十六面體，乃至於圓柱體的石幢，見劉淑芬，〈經幢的形制、性質和來源——經幢研究之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8本3分（1997），頁643-78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顏碑〈修梁吳興太守柳惲西亭記〉指出，魯公頗有使用勾勒上石之法來製碑之例，是以情況很可能沒有過去設想得單純。[68] 惟不論是書於墨本或鐫於碑版，作為載體的紙與石都具有移動性，這就會導致石刻座落地可能與書寫地或鐫刻地脫鉤。僅就魯公宦遊碑刻論，至少有16件存在著如此情況，而其中固有相當比例是應邀而作，但也部分是魯公製好碑版後，刻意將其搬運至他預先安排好的地方樹立。正因如此，魯公有若干宦遊石刻最終並非坐落在其宦遊途徑上，而使其分布益廣。

以上通過描述性方式，設法解析顏真卿宦遊石刻的複雜創制脈絡，為更方便讀者掌握，且將其中環節拆解開製成下表：

表2　顏真卿宦遊石刻的創制環節

製作地點	發動者	主題	題寫方法	呈現型態	造石刻者	座落地點
任所 赴任途中 返京途中	主動書造 被動受邀	敘政 敘人 記事 佛教 道教 地方勝蹟 旅遊題名 旅遊題字 親族 藝文	書丹 墨本	碑版 柱幢 摩崖	自己 他人	任所 赴任途中 返京途中 其他

由於以上各環節分項，多能和隔壁環節分項締結複數關係，遂得構成魯公宦遊石刻的多采樣貌。接下來，就讓我們藉由一些實例，更深入把握魯公宦遊石刻的獨到之處。

[68] 薛龍春，〈名稱、書寫及環境所塑造的風格——圍繞浙大藏顏真卿殘碑的三個問題〉，頁128-130。關於此新初顏碑的資訊與重要性，見氣賀澤保規，〈新発見唐代顔真卿撰書「西亭記碑」の理解とその歴史的意義〉，頁293-3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顏真卿宦遊石刻的特色面向舉隅

前節說到，本文為求更針對性地呈顯顏真卿宦遊石刻特點，將其主題重新分作「敘政」、「敘人」、「記事」、「佛教」、「道教」、「地方勝蹟」、「旅遊題名」、「旅遊題字」、「親族」、「藝文」十類。應先聲明，這些主題並非全然互斥，且可能並存在單一石刻，惟筆者行文時，會優先突出較能顯現魯公碑刻特色的面向，而不刻意求全。

由以上所列可以很容易發現，顏真卿宦遊作品除了過往石刻最常見的敘政、敘人、記事等大類外，還存在一些相對罕見的主題。值得首先指出的，要屬魯公在宦遊過程中觀覽各地勝景時留下的「旅遊題名」。前舉楊殿珣《石刻題跋索引》中，雖有相當數量的盛唐以前石刻作品被歸入「題名題字」大類，實則構成複雜，不宜一概而論，筆者的初步觀察是，盛唐以前所謂的「題名」石刻，多屬官方活動或事件的連帶產物，[69] 至如魯公那種純源自私人遊玩時的臨時起意則較零星，[70] 大抵要到玄宗開元年間（713–741），後

[69] 隨舉其例，如刻曹魏景元四年（263）的〈李苞通閣道題名〉，即曹魏官員李苞率領兵工打通入蜀閣道後所鐫；刻於隋開皇三年（583）的〈雲臺山王謨題名並詩〉，乃時任海州刺史的王謨巡歷至此所留；又如刻於乾封元年（666）的〈王知慎題名〉，極可能是唐高宗在泰山封禪後行投龍儀式時的紀錄，分見楊殿珣，《石刻題跋索引》，頁335、338。關於〈王知慎題名〉，參雷聞，《郊廟之外：隋唐國家祭祀與宗教》（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頁146-148。

[70] 可參陳惠芬，〈唐代題名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8）。當然，盛唐以前也不是全然未見旅遊題名，比如北魏著名大書家鄭道昭（？–516）就在山東雲峰山、天柱山、玲瓏山等地留下不少此類作品，惟鄭道昭的題名刻石雖自趙明誠《金石錄》以降間有見錄，但真正被大肆發揚已要遲至清代道咸年間，因此在歷史上大概影響有限，又，晚近研究指出，其作帶有很強的個人宗教實踐意涵，和這裡所言的旅遊題名性質不大一樣。見于書亭，《鄭道昭與四山刻石》（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4），頁8、116-121；Robert E. Harrist, *The Landscape of Words: Stone Inscriptions from Early and Medieval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8), pp. 93-155。事實上，盛唐以前的題名刻石應有許多都屬宗教實踐產物，刻於開元七年（719）海州東海縣的隸書摩崖〈鬱林觀東巖壁紀〉就提到截至當時「遊名山、勒銘記者，非思入上元，道存虛白，亦何能造次不遠而為之」，錄文見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6-8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據民國甲子年吳興劉氏希古樓刊本影印），卷51，頁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作法才漸成風氣。歐陽脩曾對鐫刻於華山的眾多唐五代題名作過如下歸納：

> 自開元二十三年（735），迄後唐清泰二年（935），實二百一年，題名者五百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一人，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游，或子侄並侍，或寮屬將佐之咸在，或山人處士之相攜。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適。[71]

華山作為距離唐代京城不遠的著名勝景，累積的旅遊題名當有相當代表性，可據此推斷此風約興起於開元年間。

歐陽脩其子歐陽棐編錄的《集古錄目》則指稱〈華嶽題名〉的首題，係由玄宗譽為詩書畫「三絕」的鄭虔（691–759）所留，[72] 現存資料顯示鄭虔對自書石刻懷有高度興趣，[73] 慮及他在當時文化界的名聲，或可推測多少源自其鼓動，旅遊題名風氣遂開始流行於官僚士人群體——無論是自行協伴登臨，抑或利用「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勞」的「宦遊」間隙。而此時正是好書的魯公甫步入宦場之際，難免要受感染，並在時機到來時以實際行動響應。以758年的〈華山廟題名〉為起點，魯公陸續在幾次宦遊期間留下〈東、西林寺題名〉（766）、〈靖居寺題名〉（767）、〈寧國題名〉（771）等系列旅遊題名，數量之豐以致成為北宋所能見到最集中的唐代個人題名石刻。[74] 就此

---

[71] 歐陽脩，《集古錄跋尾》，卷6，〈唐華嶽題名〉，頁9。

[72] 歐陽棐，《集古錄目》，卷6，〈唐・華山石闕題名〉，頁7。鄭虔「三絕」之譽，見歐陽脩、宋祁撰，《新唐書》，卷202，〈文藝中・鄭虔傳〉，頁5766-5767；生平見陳尚君，〈鄭虔墓誌考釋〉，收入氏著，《貞石詮唐》（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頁207-232。

[73] 陳尚君發現俄藏敦煌文獻10839號存有鄭虔寫給一位擅長刻碑的「陳博士」之殘信，內云：「昨日於一處見公鐫碑□，殊為精妙。又知造《代國公主碑》，若事了，得同東行，要何可言。虔于江外制三碑，兼自書，二在常州，一在湖州，便同舟往□鐫，亦是小濟耳。必當定決也。鄭虔白。」他推斷鄭虔的華嶽題名當作於此函後數月。若然，鄭虔在735年以前就已有書立三碑之經驗。見陳尚君，〈鄭虔墓誌考釋〉，頁214-215；該文書見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等編，《俄藏敦煌文獻》，第1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頁67。

[74] 朱長文纂輯，何立民點校，《墨池編》，卷18，〈唐碑下・題名〉，頁604-60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說來，魯公題名作品興許也對宋代文人的熱衷題名發揮了推波之效。[75]

顏真卿主動書造的另群特色石刻，展現在其部分「親族」類作品。嚴格說來，此分項在石刻學上並不是很適當，因為內容多與敘人主題疊合，然就魯公這則個案言，應有獨立出來討論的價值。如所周知，顏真卿出身自歷史悠長且文化底蘊深厚的中古名族瑯琊臨沂顏氏，因此對自己的家世擁有強烈的榮譽感及責任心，格外積極想通過石刻文字發揚、延續家族榮光，前文談到魯公卸任撫州後沒有馬上還京，而是先返回潤州白下整理顏氏故塋，並在此新立許多先人碑誌，就是很好的體現。除此之外，魯公還有不少相關作品，[76] 不過這裡想要指出，其所造「親族」類石刻並不僅限內容與「敘人」大類相疊合者，而還有一些有意思的創發。一個例子是他在平原任上造的「紀顏氏三典茲郡」碑，表面上看，此碑像是普通的敘政碑，實際上，魯公卻是想藉此展示顏氏的光輝歷史，因為是碑主角正是在數百年內先後出掌此郡的顏裴（曹魏時人）、顏之推（531–六世紀末）及他本人三位顏氏族人。如此成就顯非普通家族所能達致，自然罕見既有碑志，惜此碑毀於安史之亂，後世已無緣得見。

不過另件特別的「親族」類石刻，倒是以拓本形式順利流傳下來，即顏真卿擔任湖州刺史時書立的〈干祿字書〉碑（圖7）。《干祿字書》係魯公伯父顏元孫（668–732）所著，乃一字學作品，專門徵集當時擁有數種異體寫法的漢字，進而敘明何種寫法屬「正體」、何種屬「通體」、何種又屬「俗體」。此書編纂有一具體目的，即提供給當時士子撰作文章時的選字憑依，尤其是準備參加科舉考試的考生——因名「干祿」。由於此書的高度實用性，寫成後頗「行於世」，及至魯公出掌湖州，他想必認為若將其文鐫於碑版，不僅可嘉惠轄內士子，還可光耀伯父之個人學術、乃至整個顏氏的文化

---

[75] Robert E. Harrist, *The Landscape of Words: Stone Inscriptions from Early and Medieval China*, pp. 273–282；羅昌繁，〈北宋石刻題名的常與變——兼論石刻題名的唐宋轉型〉，《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期（2023），頁101-112。

[76] 顏真卿此類碑刻除父系外，亦兼及母家殷氏和部分姻親，見文末表3〈顏真卿宦遊石刻總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成就，遂在773年親自正書上石，樹立在刺史宅的東廳院。⑰ 也就是說，此碑固然有公共的一面，但魯公定也不無私心。這種鐫刻已流通之私人作品的石刻，基本可歸入《墨池編》中的「藝文」類，或置於戶崎哲彥認為較晚出現的「文學」類理解，由此就可連結到另一有意思的現象，即魯公宦遊石刻中有一定比例即屬此類。

從現存顏真卿宦遊石刻看來，其書刻私家「藝文」作品多出於主動，而大抵存在兩種創制脈絡。一是根據前人已樹之舊碑重書新立。最具代表性的要屬他在平原太守任上書造的〈東方朔畫贊〉。據魯公同時撰書的〈碑陰記〉可知，這是他在天寶十三載（754）冬率領一批親友至州境迎接巡查使臣時的意外產物。身為太守的魯公，本就知曉州境附近建有著名漢代鄉賢東方朔（154 BCE–93 BCE）祠廟，遂順道往參。抵達後，魯公一行在祠廟中庭發現一塊「駮蘚生金」、難以卒讀的石碑，加以清理發現碑上文字原來是西晉散騎常侍夏侯湛（243–291）的〈東方朔畫贊〉。⑱ 此文之作緣因夏侯湛自京師來省在東方朔老家厥次所在的樂陵郡擔任官長之父親，途經此廟，見畫興感，乃援筆寫成。⑲ 是文後在東晉南北朝流傳甚廣，不僅傳聞王羲之曾用小楷親書，後亦被收入《文選》，無疑為一名篇。⑳ 想因如此，於唐開元八年（720）出任該地刺史的韓思復（652–725）決定將此文刊於石碑，立在祠中，以收增華之效。這正是魯公一行所見之碑，惟因後續維護不力及環境侵蝕，本就「纖靡」的碑文「已不可識」。有感前人苦心，魯公重新手書立石，且為使留存更久，「不復課其工拙」地刻意書以較肥大的字體。㉑

⑰ 顏元孫生平，見顏真卿，〈朝議大夫守華州刺史上柱國贈秘書監顏君神道碑銘〉，其生卒年考證，見朱關田，《顏真卿年譜》，頁9-10、2-30。關於《干祿字書》的編纂原則及目的，見顏元孫，〈干祿字書序〉，收入董誥等編，《全唐文》，卷203，頁2049。

⑱ 黃本驥輯，《顏魯公集》，卷5，〈東方先生畫讚碑陰記〉，頁6。

⑲ 夏侯湛，〈東方朔畫贊并序〉，收入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1），《全晉文》，卷69，〈夏侯湛二〉，頁1857。

⑳ 蕭統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卷47，〈贊・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贊并序〉，頁2117-2120。

㉑ 黃本驥輯，《顏魯公集》，卷5，〈東方先生畫讚碑陰記〉，頁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顏真卿在宦遊途中書刻私家「藝文」類作品的另一脈絡，則是純出於他的新製。就現存著錄看來，魯公最早的此類作品係鐫刻於大曆五年（770）四月的「書馬伏波語」。「馬伏波」即東漢開國名臣馬援（14 BCE–49），因獲封伏波將軍而有此稱，儘管功名甚盛，為人卻端厚如一，據傳曾誡兄子云：「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而得後人深許。[82] 魯公正是轉書此語，並在題名之後明確寫下此作的刻立者是他在撫州任上結識的道士譚仙巖。儘管沒有關於此事的更多資訊，但可推測魯公乃應邀而寫，惟難確定此語究竟出自譚仙巖指定，抑或魯公親擇。接下來幾件此類作品則均作於顏真卿罷撫後的一年多。一是771年他在江南遊蘇州虎丘時，於崖壁上刻寫其甚喜愛的清遠道人〈遊虎丘詩〉。此作現仍有拓本傳世（圖8），雖被學者斷定為脫離原迹的後世重造，不過魯公自己撰有〈刻清遠道士詩因而繼作〉詩，可知他確曾書刻此作。二是他在771、772年之交於潤州上元蔣山寺（後改靈谷寺）留下的〈書李白誌公像贊〉，惟著錄所見亦為重刻後的碑版，書體、形制均非原貌。三是魯公在大曆七年（772）四月四日於其上元祖塋，書立南朝名士李闡、顏延之（384–456）為其十三世祖顏含合撰之碑文，用以彰顯先祖之德。[83] 由上舉諸例可以看到，魯公新造的「藝文」類石刻內容多樣，全視當下情境，清楚展現魯公在書石造碑上的自由隨興。

由顏真卿為道士譚仙巖書馬伏波語，及他在旅遊途中書刻清遠道人詩二事，還可延伸出魯公留下的另一特別宦遊石刻大類，即他在撫州任上留下的四方「道教石刻」。在這四方石刻裡，同書立於大曆四年（769）三月的〈魏夫人仙壇碑〉與〈華姑仙壇碑〉固為應邀所撰，然餘下的〈橋仙觀碑記〉[84]

---

[82] 馬援此語見東漢後期孫穆所著〈崇厚論〉，見范曄撰，《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卷43，〈朱樂何列傳〉，頁1465。

[83] 順帶一提，顏真卿在同年稍後北返時，亦曾在途經十四世祖顏默終官的潁州時，為其書造〈顏默碑〉，前人推測極可能和〈顏含碑〉一樣亦為「重書舊文」。見黃本驥輯，《顏魯公集》，卷28，〈書評八・顏默殘碑〉，頁16。

[84] 此碑在黃本驥輯，《顏魯公集》，卷6中作〈華蓋山王郭二真君壇碑銘〉，然朱關田認為，此應為魯公訪得的「焚修道士李子真舊文」之題名，至於魯公所作之碑，題名應係陳垣《道教金石略》中所載的〈橋仙觀碑記〉，分見朱關田，〈顏真卿書迹著錄考略〉，頁152-153。本文從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與〈麻姑仙壇記〉則均足反映魯公在創制此類石刻時亦具極高的主動性——這在既有的道教石刻中也很罕見。[85] 以〈橋仙觀碑記〉為例，此記開首即云：

> 粵以江南之地，佳麗垂名，山嶽之間，宛有仙洞。余（顏真卿）祇膺聖澤，廉察臨州，一日按地理圖，得屬邑崇仁縣華蓋山有王、郭二真君壇存焉。欣覩異事，未原其始。他日公餘，因令軍將往山下訪求碑銘，果得一石記，乃隋開皇五年焚修道士李子真於壞碑上再錄出其文，則知王、郭二真君仙不顯名。[86]

從引文可知，魯公原就對廣佈在江南的眾仙跡傳說備感興趣，[87] 因此在翻閱唐代地方官員常用來增進轄境認知的「圖經」類文獻時，[88] 格外留心相關資訊，從而發現位在撫州崇仁縣華蓋山上的王、郭二真君壇。這兩人顯然不是太有名的人物，是以魯公一時無法知悉此壇來歷，遂在公暇時派人前往該處「訪求碑銘」，果真找到一方由隋朝道士李子真自一塊「壞碑」轉錄而來、記載著王郭軼事的石記，從而得知兩人乃是西晉道者，據傳在元康二年（292）二月一日修練完滿，於此白日昇天。感嘆不已的魯公因此特撥「公用錢」為遺壇更換「殿宇門廊」，並在竣工後撰文立碑加以紀念，是為〈橋仙觀碑記〉。儘管此碑今已不見書迹，內文卻順利保存下來，讓本來幾要被遺忘的王、郭兩人得為後世銘記。就此而言，魯公亦可謂達成立碑目的了。

---

[85] 顏真卿以前的道教類石刻，參見陳垣，《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頁1-149。

[86] 黃本驥輯，《顏魯公集》，卷6，〈華蓋山王郭二真君壇碑銘〉，頁11。

[87] 顏真卿向有好仙道的記載，見《顏真卿評傳》，頁175-181。他在湖州結交的摯友皎然（730–799）曾以「吳興太守道家流」形容之，見皎然，《杼山集》（四庫唐人文集叢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卷7，〈奉同顏使君真卿清風樓賦得洞庭歌送吳鍊師歸林屋洞〉，頁60。

[88] 李斌城主編，《唐代文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下卷，頁1652-1654。是書認為，隋唐圖經的編纂相較南北朝更普及，並主張此與隋唐郡縣佐官均用他郡人充任，遂使此類輔助工具書的需求增加。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相較王、郭二道，早見於葛洪《神仙傳》、且自南北朝末期即列名在女仙系譜的麻姑就要著名得多，[89] 撫州既相傳留有其遺跡，鍾情道教的顏真卿自不會放過。據〈麻姑仙壇記〉，魯公同樣在刺撫之初即得知此地有麻姑得道古壇：

> 大曆三年，真卿刺撫州，按《圖經》，南城縣有麻姑山，頂有古壇，相傳云麻姑於此得道。壇東南有池，中有紅蓮，近忽變碧，今又白矣。池北下壇傍有杉松，松皆偃蓋，時聞步虛鐘磬之音；東南有瀑布，淙下三百餘尺；東北有石崇觀，高石中猶有螺蚌殼，或以為桑田所變。[90]

在此段文字，魯公不僅介紹了相傳為麻姑得道之所的南城縣麻姑山古壇，更連帶對其東南的蓮花池、壇旁杉松、周邊的瀑布和石崇觀進行細膩描述，諸如「（池）中有紅蓮，近忽變碧」，或者「（石崇觀）高石中猶有螺蚌殼」等句，若未身歷其境悉心觀察，大概很難寫出。魯公此碑撰於〈魏夫人仙壇碑〉與〈華姑仙壇碑〉後，時對撫州源遠流長且至今猶盛的道教傳統已瞭然於胸，或許因為離撫在即，油然興起一股「幸承餘烈」之感，終決定撰寫此文並「刻金石而志之」。[91]

若從更廣泛角度看待撫州的王郭二道及麻姑遺跡，則可說它們均屬於地方性勝蹟，而此類資訊大量記載於出現在前兩段引文的「地理圖」與「圖經」。此類載有個別州境內的山川水道、名勝古蹟之文本，源自南北朝的州郡地志，儘管學者指出，此類文本發展至唐代似越重視實用面，因強調其中應包含與國民生計有關之內容，[92] 然這些地方勝蹟無疑仍是其中的重要構成——用較現代概念說，這些均是對地方別具意義的文化資產，地方官若能有

---

[89] 顏真卿以前的麻姑仙傳發展，可參陳文妍，〈顏真卿《麻姑仙壇記》對壽神形象之接受與再塑〉，《中華書道》，124期（2024），頁38-41。

[90] 黃本驥輯，《顏魯公集》，卷5，〈撫州南城縣麻姑山仙壇記〉，頁11。

[91] 魯公在文末追述自麻姑、魏夫人（華存）、華姑以降直迄當時的撫州道教系譜，並大嘆若非「地氣殊異，江山炳靈，則曷由纂懿流光，若斯之盛者矣！」黃本驥輯，《顏魯公集》，卷5，〈撫州南城縣麻姑山仙壇記〉，頁11。

[92] 胡寶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州郡地志〉，《中國史研究》，2001年4期，頁13-2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效掌握，定有助收攏民心、輔翼治化。從顏真卿在兩份文本中均刻意突顯自己係以刺史身分進行閱讀，即可知此行為背後蘊藏著實際的政治目的。但有別於多數地方官，魯公在閱覽之餘，還懷有按圖索驥精神，常通過直、間接地實地勘察，更進一步深入轄區的歷史與文化。類似舉措實不限於魯公傾心的道教，如他在出掌湖州時，亦透過友人陸羽（733–804）所撰《圖經》得識轄境內的項羽祠廟，也才能在大曆十二年（777）接獲朝廷恩詔準備上京時，專程前去重立〈項王廟碑〉暨書碑陰，[93] 足見魯公始終都對其管地的各類勝蹟懷有相當留心。

顏真卿最特出的「地方勝蹟」類石刻，要屬至清代還看得到部分殘留的〈湖州石柱記〉。此柱傳說亦是魯公在湖州時所造，立於州中杼山。儘管石柱至北宋時文字已漫漶難考，然據曾親眼考察殘柱的歐陽脩言，其上字跡「筆畫奇偉，非顏魯公不能書」，[94] 是以宋人多將之視為魯公在湖州留下的重要遺物。從殘存文本可知，〈石柱記〉按縣別類，先個別介紹下轄諸縣級別、位址，再依序介紹各縣中的特色景物。[95] 以長城縣為例，其下載有：

> 大雷山、芳巖、震澤、若溪、吳王夫概廟、陳景帝陵、陳錢皇后陵、陳昭烈王陵、謝安墓、殷仲文墓、陳武帝故宅、陳文帝故宅、吳均故宅、陳氏五主屏風、陳高祖竹帳、國朝高僧南山律主道宣。[96]

---

[93] 黃本驥輯，《顏魯公集》，卷5，〈項王碑陰述〉，頁20-21。

[94] 歐陽脩，《集古錄跋尾》，卷8，〈唐湖州石記〉，頁1。當然，歐陽脩的判斷也非全無疑義，如普遍認為不大可能是顏真卿親書的〈小字麻姑仙壇記〉，他也在一番「把玩」後，「愈看愈佳」，斷定「非魯公不能書也」。見同書卷7，頁8。

[95] 之所以僅存部分文本，係因湖州府治卑濕，石柱一度被拿去埋填淤泥，至清康熙年間才又由修纂《湖州府志》的鄭元慶重新訪得。惟湖州在唐時置五縣，然清時石柱殘文僅餘烏程、長城、安吉三縣，且多有闕失，朱彝尊（1629–1709）遂仿其體例，輯補德清、武康二縣事跡，再由鄭元慶箋證撰成《石柱記箋釋》一書。見朱彝尊，〈石柱記序〉，收於鄭元慶箋釋，《石柱記箋釋》（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1；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70，〈史部．地理類三．古蹟．石柱記箋釋五卷〉，頁1518。

[96] 黃本驥輯，《顏魯公集》，卷5，〈湖州石柱記〉，頁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內容包羅萬象，既有山巖、溪澤等自然景觀，又有陵廟、墓宅等人為建築，屏風、竹帳等珍品遺蹟，最後更提及在地人傑初唐高僧道宣（596–667），可說是長城縣內的自然人文薈萃。換言之，石柱記是以全州境的風景勝物為書寫範圍、以轄下五縣作為編寫架構，以縣繫物地進行安置。此種書寫模式，頗近於唐代地方官編纂的《圖經》，這當是〈石柱記〉又被稱作《吳興地記》之故。[97] 不過〈石柱記〉最特別處在於，這些內容被加以銘刻上石，以物質性形式被樹立在地方，這在所有地志類文本中可謂空前絕後。[98]

以上論及的「旅遊題名」、「親族」、「藝文」、「道教」、「地方勝蹟」等石刻主題，雖多半在魯公以前就已出現，但或為數有限，或多屬應酬式作文，絕少如魯公這般主動且集中書造，是以在許多面向上，都頗有打破既存框架的意味。比方過去的「親族」刻石多是採「敘人」寫法，魯公卻能與「藝文」相結合——不論是書立前賢撰來謳歌其先祖的舊文，還是逕拿其長輩著述上石；在「道教」與「地方勝蹟」主題，也不再局限於被動之作，而有更多主動性的探索與發揚，從而豐富了這些主題內涵。另方面仍需指出，此前一直是石刻最大宗的「敘政」、「敘人」、「記事」等內容，在顏真卿宦遊石刻裡依舊占據頗大比重，但讓人欽佩的是，儘管主題承舊，魯公還是有辦法展現其創意。

比如立於大曆九年（774）的〈乞御書天下放生池碑額表〉（圖9），其內容基本不出「敘政」和「記事」二主題，然形式卻很特別。此碑之製成頗

---

[97] 如源乾曜任夔州參軍時，曾編有《夔州圖經》，見李貽孫，〈夔州都督府記〉，收入董誥等編，《全唐文》，卷544，頁5515。保存在敦煌文書中的《沙州圖經》（S. 2593）卷一為州，卷二、三、四是敦煌縣，卷五為壽昌縣，同樣也是以行政單位作為編纂架構，可與〈湖州石柱記〉相參照。池田溫曾就沙州所出殘《圖經》中標有無法對應之項目推斷，唐代官方或曾頒布過統一的修纂體例，並以三年一貢方式，與版籍、地圖一同奏報朝廷，見池田溫，〈沙洲圖經略考〉，收入榎博士還曆記念東洋史論叢編纂委員會編，《榎博士還曆記念東洋史論叢》（東京：山川出版社，1975），頁39-46；類似看法見華林甫，〈隋唐《圖經》輯考（上）〉，《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27期（2007），頁148。

[98] 有學者懷疑石柱或為後人追立，見朱關田，〈顏真卿書迹著錄考略〉，頁200。不過筆者認為，以魯公造碑之創意，及他喜為境內地方勝蹟書石立碑之作風，無法全然排除其可能，姑從前人判斷，將其視作魯公石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曲折，最早發軔自魯公於乾元二年（759）刺昇之際，該年冬天，肅宗要求「於天下州縣臨江帶郭處」各置放生池八十一所，力圖在動亂期間「宣皇明而廣慈愛」，而由於此工程的最東界正在昇州，魯公遂突發奇想，特「以俸錢於當州採石」，自書〈天下放生池碑銘〉，並於隔年上表祈請肅宗親撰碑額，以求彰顯德音。[99] 然就在蒙獲肅宗應允不久，魯公旋於八月被貶為蓬州司馬，立碑之事因而中斷，直到魯公在大曆八年（773）出任湖州刺史時，方續成此願。〈乞御書題額恩敕批答碑陰記〉對此載之甚詳：

> 爾來十有六年，困於疏愚，累蒙竄謫，其所置碑石，迄今委諸巖麓之際，未遑崇樹。七年秋九月歸自東京，起家蒙除湖州刺史。來年春正月至任，州東有苕、霅兩溪，溪左有放生池焉，即我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所置也。州西有白鶴山，山多樂石，於是採而斲之，命吏幹磨〔礱之〕，家僮鐫刻之，建於州之駱駝橋東。蓋以抒臣下追遠之誠。[100]

文中的「十有六年」，接在大曆六年（771）秋八月之後，倒推回去恰是安史之亂爆發的天寶十四載（755），因此下文的「困於疏愚，累蒙竄謫」，當泛指魯公在亂後的大致處境，距實際發想應只有十二年。轉任湖州刺史的顏真卿，或因目睹位於州東的放生池，憶起過去在昇州「未遑崇樹」之憾，遂重新採石，令「吏幹」、「家僕」斲礱鐫刻，終在大曆九年（774）正月在駱駝橋東正式樹起。儘管其時肅宗已逝，御筆題額的乞願落空，魯公仍補償性地銘刻上肅宗字跡——他特別選集「先帝所賜敕書批答中諸字」（圖10），於碑上「緝而勒之」，試圖重現肅宗御批，並在是年八月追立於駱駝橋東。[101]

管見所及，顏真卿以前似還無人嘗試集結皇帝御批字跡，進而將其鐫刻上石。也就是說，這是極為罕見的作法，清楚反映魯公在造碑一事上遠較常

---

[99] 黃本驥輯，《顏魯公集》，卷1，〈乞御書天下放生池碑額表〉，頁6；卷6，〈天下放生池碑銘〉，頁3-4。

[100] 黃本驥輯，《顏魯公集》，卷5，〈乞御書題額恩敕批答碑陰記〉，頁13。「礱之」二字據拓本補，見朱關田編，《顏真卿書法全集（珍藏版）》，第5卷，頁288。

[101] 立碑時間據朱關田，《顏真卿年譜》，頁26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人靈活且富創造力的思考。[102] 正因如此，當魯公被派任至以產石聞名的撫州及湖州時，其書石活動也隨之噴發，更開發出一些前所未聞的製碑手段。比如魯公於撫州為其眾伯叔、母舅殷踐猷及其子書刻的一系列親族墓碣，都是他在當州「採石刻頌」後，遣人護送至這些親族的「墓左」崇樹——其伯叔之墓位在長安的顏氏祖塋，母舅殷踐猷及其子墓則位在河南府新安縣，距離撫州均超過一千公里，無疑都得耗費相當工程。[103] 此外，顏真卿在大曆六年（771）十一月立於潤州白水祖塋的〈顏含大宗碑〉，也被懷疑是像〈殷踐猷碑〉那般書刻於撫州，再攜至該地樹立，[104] 果真如此，則此作法距離北宋《廣川書跋》記載魯公晚年經常「載石以行」、「遇事以書」就已不遠，差別只在後一方法僅攜帶做過打磨加工的碑版，碑面則呈空白，留待魯公應機揮灑。[105] 此事固不可思議，但魯公自己也確曾說到他嘗讓「家僮鐫刻」其書，反映造碑之頻，[106] 凡此均讓魯公熱愛書石的形象深植人心，是以無論魯公是否真有「載石以行」、「遇事以書」行徑，下文馬上就會看到此傳聞在他過世後不久就已傳開，並被當成事實接受。

---

[102] 另應指出，魯公此舉仍當懷有政治上的目的，即藉此讓當朝皇帝代宗（726–779，762–779在位）看到即便他屢經挫折，仍對先帝懷抱「追遠之誠」，也就是說，是碑之立實帶有向今上輸誠的味道。與此可加類比的，是他書造於大曆八年（773）的〈文殊師利菩薩碑〉，此碑書文雖均亡佚，然據傳世的〈文殊帖〉可知，此碑是魯公「欲發揚主上勝意」所造。所謂的「主上勝意」，當是代宗在前一年（772）底於不空大師（705–774）建議下，敕令在全國官寺均設置文殊院，推動文殊菩薩信仰一事，換言之，此乃魯公主動響應朝廷政策之創制，而不僅是單純的佛教石刻。關於不空在代宗朝的文殊信仰建設，可見岩崎日出男，〈不空三蔵の五臺山文殊信仰の宣布について〉，《密教文化》，181期（1993），頁40-57。

[103] 事實上，這些例子裡明言係採「採石寄碣」方式建成的，只有造於大曆五年（770）的〈殷踐猷墓碣〉，見黃本驥輯，《顏魯公集》，卷11，〈曹州司法參軍祕書省麗正殿二學士殷君墓碣銘〉，頁4-6。不過朱關田推測，魯公在前一年為其伯叔、同年為其表昆仲殷攝所造之墓碣亦皆採取此法，筆者以為可從。參朱關田，《顏真卿年譜》，頁190、197。

[104] 朱關田，《顏真卿年譜》，頁212。

[105] 原文為：「顏太師以書自娛，平生意好惟此不替。晚年嘗載石以行，韞而藏之，遇事以書，則隨所在留其所鐫石。」見董逌，《廣川書跋》（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卷8，〈放生池碑〉，頁151。

[106] 語出黃本驥輯，《顏魯公集》，卷5，〈乞御書題額恩敕批答碑陰記〉，頁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也因為顏真卿的書石經驗豐富異常，他逐漸在實踐過程中累積出一些更有利於石刻風格表現的技巧。前面提到他在重新書刻〈東方朔畫贊〉時，就刻意將字的筆劃寫得粗大，以追求「字大可久」之效；[107] 另外，魯公在〈乞御書天下放生池碑額表〉中亦提到，他在昇州萌生祈請御書之念時，即在「當州採石」兼「自書」一份絹本請表，交付至州宣命的使臣帶回朝廷，然不久就感到這件作品「點畫稍細」，即便鐫刻恐怕也「不堪經久」，於是又實際根據製成的碑版大小，重新「擘窠大書一本」，再次奉進。[108] 這些例子清楚反映顏真卿深刻認知到石材媒介的物質特性與視覺效果，因此很有意識去調整書風，讓石刻書迹能有更多機會長久留存——前引歐陽脩稱多「鉅書深刻」的顏真卿「用意未嘗不為無窮計」，確可說是精準觀察。是以有學者主張，魯公後期碑刻多用粗筆，極可能是因應愈加豐富的書石經驗所作出的有意調整，[109] 而當我們進一步慮及魯公所以能夠如此盡情造碑，正是因為他被派往出掌以產石聞名的撫、湖兩地，則不妨認為最被視作典型顏楷特徵的肥大書風，正是由魯公遠勝常人的宦遊經驗及書石熱情所交織催生！

四、顏真卿宦遊石刻在中晚唐的存與滅

透過前三節考察，我們已可大致把握顏真卿所以能創制出為數如此眾多、分布如此廣泛之石刻的根本緣由——即漫長的宦遊經驗與異常的書石熱情——也基本可以斷言，整個中古時期再難找到像顏真卿這般兼具主、客觀條件的著名書家，就此而言，魯公留下的石刻數量得以冠於唐人，可謂是水到渠成。但應留意，這樣的判斷很容易落入後見之明，事實上，魯公石刻所以能順利流傳到後世，絕對沒有如此理所當然。以今日所見為例，我們雖可自歷代著錄中蒐集出140餘件作品，然書迹尚存者僅約60餘件，屬石刻書迹者

[107] 黃本驥輯，《顏魯公集》，卷5，〈東方先生畫讚碑陰記〉，頁6。

[108] 黃本驥輯，《顏魯公集》，卷1，〈乞御書天下放生池碑額表〉，頁6。

[109] 薛龍春，〈名稱、書寫及環境所塑造的風格——圍繞浙大藏顏真卿殘碑的三個問題〉，頁128、131-13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更不及一半，比例顯然沒有想像得高；至於本文聚焦處理的「宦遊石刻」就更有限，只有約65件見於著錄，仍存拓片或碑石者則不過16件。⑩

我們現在很清楚，今日所以能夠留存如此數量的顏真卿書迹，很大程度源自宋人的努力，而他們所以有此意識，當然是因為已注意到有為數不少的魯公書迹未獲得妥善保存。歐陽脩雖在《集古錄》中稱魯公遺蹟「處處有之」、「唐人筆蹟見於今者，惟公最多」，然其寓目的魯公石刻就已存有不少缺憾，如他說〈大唐中興頌〉因常被「模打」拓印，致原石已多「殘缺」；被他譽為顏書「最佳」的〈射堂記〉，同樣因為「殘闕」使其惋惜不已；〈湖州石柱記〉亦「文字殘缺，其存者僅可識讀」；他甚至還收有兩方連題名都無法辨識的「顏魯公書殘碑」。⑪ 稍晚一些的趙明誠《金石錄》也記載了若干魯公殘碑，如他提到樹於長安的〈顏勤禮碑〉，在元祐年間（1086–1094）就遭到地方官長取去作為新建的後圃亭榭基址，雖然過程未對碑身造成嚴重損毀，然其上銘文幾遭「摩去」；又如立於潁州的〈顏默碑〉，也被當地人家拿去作為「馬臺」，至皇祐年間（1049–1054）才被識者認出，「因摹本以傳」。⑫

稍堪聊慰的是，顏真卿的書石熱情使其「碑刻遺迹」至北宋猶有相當留存，時人以為遍在「荒郊廢冢，其出未已」；⑬ 此外，魯公的崇高人格也讓欽佩他的宋人對其書迹另眼有加，即便看到「殘缺」之作，亦「不忍棄之」，竭力收藏，方有諸多殘碑見錄。⑭ 而隨著金石學在北宋的漸盛，越來越多官僚士人開始對本朝以前石刻予以留心，除嘗試用文字予以系統記錄，更有能力者則展開實物收藏，或施以維護舉措。⑮ 一個著名例子是北宋儒者孫覺（1028–1090），他在熙寧四年（1071）十一月出守湖州後，旋感境內遍佈前代石刻遺存，遂興起保藏之心，因於府第之北建亭，廣取境內漢代以

⑩ 參見文末表3〈顏真卿宦遊石刻總表〉。

⑪ 歐陽脩，《集古錄跋尾》，卷7，〈唐中興頌〉、〈唐顏真卿射堂記〉，頁8、15；卷8，〈唐顏魯公書殘碑〉、〈唐湖州石記〉，頁1。

⑫ 趙明誠撰，金文明校證，《金石錄校證》，卷28，〈跋尾十八・唐〉，頁535。

⑬ 朱長文纂輯，何立民點校，《墨池編》，卷9，〈品藻四・續書斷・神品三人〉，頁276。

⑭ 歐陽脩，《集古錄跋尾》，卷8，〈唐顏魯公書殘碑〉，頁1。

⑮ 葉國良，《宋代金石學研究》（臺北：臺灣書房，2011），頁6-2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降的「古文遺刻」貯藏其間，並取名為「墨妙亭」。[116] 墨妙亭所收石刻清單現雖不見，然我們可在南宋嘉泰年間（1204–1204）編成的官修地方志《吳興志》中找到三十餘通，可知其中至少收藏了魯公的〈射堂記〉、〈項王廟碑陰述〉、〈干祿字書〉、〈湖州石柱記〉、〈晉謝太傅塘碑〉、〈沈氏述祖德碑〉諸作。[117]

儘管如此，要順利將魯公石刻書迹傳至後世仍不容易。續以墨妙亭為例，其所收諸碑在歐陽脩編寫《集古錄》時已多文字殘損，[118] 後世更因湖州府治卑濕，亭中諸石盡被「取以填淤泥」，[119] 以至今日所能見到的墨妙亭所藏魯公石刻書迹，僅剩下甚早就有拓片傳世的〈干祿字書〉。這也顯示，儘管顏真卿在所到之處均企圖通過「鉅書深刻」於石質媒材的方法，致力使其文字得以傳諸久遠，現實卻是，若無後世知音的有心蒐集、維護、保存，即便是看似牢固的石刻文字，依然會輕易淹沒在歷史的滾滾洪流，不復可見。[120] 正因如此，今日論及顏書流傳的學者均不會忽視歷代收藏者的巨大貢獻，惟過去論及顏真卿作品之保存，多將重點放在對顏書推崇備至的宋代以後，[121] 不過本文想進一步指出，其實早在魯公過世不久的中晚唐，即留下不少涉及顏真卿石刻後續際遇的討論——且多屬宦遊石刻——從中可以得知，魯公石刻書迹所以能大量留存至北宋，絕非僅憑魯公個人的積極書石就能成就。

---

[116] 蘇軾，《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11，〈墨妙亭記〉，頁354-355。

[117] 談鑰纂修，《嘉泰吳興志》，收入《宋元方志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0，據宋嘉泰元年纂、民國三年吳興叢書本影印），卷18，〈碑碣〉，頁4837、4838、4840。

[118] 分別為〈射堂記〉、〈干祿字書〉、〈湖州石柱記〉三件，歐陽脩，《集古錄跋尾》，卷7，頁12-13、15；卷8，頁1-2。宋人王象之編，《輿地碑記目》，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24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據粵雅堂叢書本影印），卷1，〈安吉州碑記〉稱《集古錄》亦收有〈項王廟碑陰述〉，並註明為「顏氏殘碑」，見頁4。

[119] 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70，〈史部．地理類三．古蹟．石柱記箋釋五卷〉，頁1518。

[120] 蘇軾受孫覺邀請，為墨妙亭撰寫興造記時，就已清楚點出：「凡有物必歸於盡，而恃形以為固者，尤不可長，雖金石之堅，俄而變壞。」見其《蘇軾文集》，卷11，〈墨妙亭記〉，頁355。

[121] 比如Amy McNair, *The Upright Brush: Yan Zhenqing's Calligraphy and Song Literati Politic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下就以幾則實例來揭示中晚唐人在傳續魯公石刻書迹上的努力。首先可舉顏真卿第一次外派平原時所造的〈東方朔畫贊並碑陰記〉。此碑書於天寶十三載（754）十二月，創制因由上節已有說明，未及談到的是，此碑自刻成至樹立實歷經一番波折。這是因為，就在此碑製成不久，安史之亂即於河北爆發，叛軍首領安祿山（703–707）、史思明（703–761）率領大軍長驅南下、劍指洛陽，顏真卿則很快響應時任常山太守的堂兄顏杲卿（692–756）的反正旗號，投入抵禦行列，他鎮守的平原郡自也無可避免地迎來熊熊戰火。當時〈東方朔畫贊並碑陰記〉雖已造好，卻還沒正式立起，然在戰事迫在眉睫的關頭，立碑無疑已淪為無關緊要的瑣事，遂被無限期擱置。根據現存史料，我們知道魯公後來在平原抵抗了將近一年，終在天寶十五載（755）年底因眾寡不敵，不得已棄郡而去，奔赴肅宗行在，平原也因此遭到安史大軍進佔。也就是說，一直到顏真卿離開平原，〈東方朔畫贊並碑陰記〉均處在未遑樹立的狀態。

不過就在顏真卿本人也快要遺忘此事的十餘年後，他忽於撫州刺史任上（768–771）收到一位名喚吳子晁的人寄來三件碑拓，打開一看，赫然發現正是他在平原任上先後書造的〈紀顏氏三典茲郡〉、〈紀同時臺省擢牧諸郡〉，及〈東方朔畫贊並碑陰記〉三碑。吳子晁何以突然寄來魯公書造的平原三碑拓本？原來，此人是安史亂平後出任平原別駕的官員，大概在當地聽聞諸多魯公的美談軼事，遂對其造三碑備感好奇，開始刻意訪求。其時，先立於亂前的「顏氏三典茲郡」碑和「同時臺省擢牧諸郡」碑均在安史軍進佔平原時遭到破壞，所幸已有有識之士先行拓印，遂能「求得舊文」；至於亂前不及樹起的〈東方朔畫贊並碑陰記〉，則在安史軍入城前被熱心郡民「埋匿」藏起，從而以完好狀態挺過劫難，並為探知消息的吳子晁重新掘出。於是，吳子晁遂依據求得的兩篇拓本，重新「買石鐫勒」遭到毀壞的二碑，連同再見天日的〈東方朔畫贊並碑陰記〉一起「樹之郡門」，而後再將三碑拓本寄給遠在撫州的魯公，告知這個讓人慶幸的消息。[122]

[122] 據傳再次目睹三碑拓本的魯公，旋憶起當時歷經之艱辛，不禁「對之愴然」。詳見封演撰，趙貞信校注，《封氏聞見記校注》，卷10，〈修復〉，頁93-9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然而，儘管有吳子晁這樣的「好事之士」重造三碑，但其中的〈紀顏氏三典茲郡〉與〈紀同時臺省擢牧諸郡〉二碑很可能復在晚唐五代幾波大亂中折損，乃至均未見載於北宋以降金石著錄；〈東方朔畫贊並碑陰記〉碑雖然稍微好運，及至北宋尚猶屹立，然據《廣川書跋》，其時該碑字迹多已「刓剝」，主要仍賴「摹搨以傳」，[123] 且至遲到明中葉也已不復見原石。[124] 這也再次顯示石質媒介遠沒有想像得堅固耐久。話說回來，吳子晁樹立原碑依然有不可抹滅的重要性，因為若無此舉，〈東方朔畫贊並碑陰記〉碑大概再難有現世機會，遑論拓印與流通原碑文字。也正因為歷代流傳著此碑的完整拓片，今日才能精準得知其乃通高340公分、寬151.6公分的四面刻大碑，[125] 進而由拓片所存的碑上字跡來揣想魯公早期書風。

第二則例子是顏真卿在湖州任上所造，後曾收入墨妙亭的〈干祿字書〉碑。前節已說到，〈干祿字書〉乃魯公伯父顏元孫所撰的字學作品，主要在辯正字體，供參與舉試時需要撰寫文章的考生之用，帶有很強的實用目的，所以魯公書立之後很快就吸引許多人前來拓印，結果由於需求太大，在反覆且過度的磨拓下，碑面字迹陸續出現許多破損。及至開成年間（836–841），魯公姪兒顏禺聽聞其事，深憂此碑字迹就此磨滅，希望轉刻他石，然因經費不足，特向當時出掌湖州的楊漢公（785–861，838–841在任）求援，[126] 楊漢公也旋即應允，慨然提供俸錢助成此事，並在重新鐫造後，於開成四年（839）六月撰文誌之：

> 太師魯公，忠孝全德……煥乎國史……尤工隸書，盡鍾繇之精能，極逸少之楷則。曾牧茲郡……錄干祿字樣，鐫於貞石。仍許傳本示諸後生。一二工人用為衣食業，晝夜不息，刓缺遂多。親侄禺頃牧天台，懼將磨滅，欲

---

[123] 董逌，《廣川書跋》，卷8，〈摹畫贊〉，頁152。

[124] 明中葉文壇領袖王世貞（1526–1590）曾言：「東方畫像贊碑陰記，顏魯公書，石刻在陵縣，陵即古平原郡也，故城址猶存，今僅三之一耳，碑已再刻。」見氏著，《弇州山人四部稿》（明代論著叢刊本，臺北：偉文圖書公司，1976），卷135，〈文部・墨刻跋・東方畫像贊〉，頁6250-6251。

[125] 此碑資訊見朱關田主編，《顏真卿書法全集（珍藏版）》，第一卷，頁96。

[126] 楊漢公刺湖時間見郁賢皓，《唐刺史考全編》，卷140，〈江南東道・湖州〉，頁195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文字移於他石。資用且乏，不能克終。漢公謬憩棠陰，獲睹墨妙，得以餘俸成禺之意。自看摹勒，不差纖毫，庶筆蹤傳於永永。⑫⑦

這裡值得注意，楊漢公固然盛讚魯公的道德操守，但對其書藝也予以「盡鍾繇之精能，極逸少（王羲之）之楷則」的至高評價，並為自己能「獲睹墨妙」感動，足見楊漢公之襄贊很大程度源自對魯公書迹的欽喜；想因如此，他非常看重轉刻的品質，親自監看「摹勒」過程，並宣稱重鐫版較之原石「不差纖毫」，有信心定可讓魯公「筆蹤傳於永永」。楊漢公這個說法是否可信暫且不論，⑫⑧但可指出，今日所能見到的〈干祿字書〉拓本相當成分源自楊漢公重刻版系統，足證其重要性。⑫⑨

第三個例子，是顏真卿自撫州卸任，迤邐返京途中，應邀在宋州所書的〈八關齋會報德記〉。此作在大曆七年（772）五月書成不久，即被鐫立於當地，形制如前所言係特殊的八面體石幢，顯是為了該文主題訂造。不過也因如此，在唐武宗（814–846，840–846在位）於會昌年間發起強力整肅全帝國境內佛教的空前巨大法難時，這座鐫刻著顏書的佛教石幢亦無法倖免。不幸中的大幸是，在法難達到最高峰不久，武宗就驟然崩逝，而繼位的宣宗（810–859，846–859在位）則在登基後調整方針，重新推動復佛政策。就在這波復佛浪潮甫起不久，一位名叫崔倬的士人被派至宋州擔任刺史（849–852在任），並很快從郡從事處得知州內留有此殘幢，遂前往探詢，結果發現法難時期的刺史認為該石幢過於巨大，拆除麻煩，轉採擊破幢體方式破壞，以致難後僅存三個殘面，且均「委埋于土」。崔倬也很機靈，他馬上想到以魯公聲名，郡中肯定有拓印石幢文字的收藏者，於是展開調查，果真在前刺

⑫⑦ 楊漢公，〈干祿字書後記〉，收入董誥等編，《全唐文》，卷760，頁7900-7901。順帶一提，文中提到顏禺「頃牧天台」，會讓人以為和楊漢公刺湖時間相當，實則顏禺牧台當在太和二至四年間（828–830），換言之，他留心此事已有段時日。見郁賢皓，《唐刺史考全編》，卷140，〈江南東道・台州〉，頁2049。

⑫⑧ 歐陽脩《集古錄跋尾》曾據原碑拓「大曆真本」，指出楊漢公摹本「多失真」，見卷7，〈唐干祿字樣摹本〉，頁13。

⑫⑨ 參見後文註135的說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史家發現「本末完備」的「模石」，於是就依照這個完好拓本，於大中四年（850）年底重修殘幢。儘管崔倬深知如此新舊交參的「補續」，定不免造成「真贋懸越，貂狗相屬」之缺憾，但終究可以拯「魯公遺文」於堙沒，進而昭之後世，毋乃利大於弊。從結果看，崔倬的補救之舉也的確讓〈八關齋會報德記〉得以完整形式流傳，於顏書之存續居功甚偉。順帶一提，崔倬之所以如此熱心恢復殘幢書迹，除因魯公的人格感召，更在於他「自幼慕習魯公書法」，是以對顏書懷抱著格外深刻的情感——這想必也是他在發現石幢完整拓本時，居然用「輝耀溢目」這般滿懷崇敬之詞語加以形容之故。⑬⓪

前舉三例相當程度顯示，顏真卿書迹在其身後不久就已受到不少時人高度珍視，且看重之因不全然源於他的忠義氣節，還有一定比例的人是因為贊服其書法成就——最有意思的是，以上三件石刻都是宦遊遺存，由此益見魯公豐沛的宦遊經歷如何有效推動及散播書石創作，讓略晚於他的唐代時人得在帝國許多角落發現其石刻書迹。然須提醒，前舉三例都算幸運，實際上，還有為數更多的魯公宦遊石刻一不小心就由於種種原因遭到毀棄，再也無緣重見天日。關於此類不幸的魯公宦遊碑刻，歷史文獻中也可看到一些，令中唐著名文士歐陽詹（755–800）悲歎不已的九江驛碑，就是一極佳之例。

九江驛碑，顧名思義即是立於九江驛站的一塊石碑。歐陽詹之所以會接觸到此碑，係因他剛好行經江州並借宿九江驛站，而得聞同行友人提起此碑前身乃魯公書立於此地的宦遊石刻，後來卻因州吏欲向世人彰顯自己整修九江驛的功勞，將魯公是碑拿來作為石材，磨平上頭文字，改鐫刻修驛事蹟，魯公書迹遂就此湮滅。歐陽詹對此悲嘆不已，特撰〈弔九江驛碑材文〉詳述此碑原委暨大抒其慨：

> 斯碑之材，昔太師魯國顏忠肅公所建祖亭之碑也。公……好采異留名之致，頃為湖州牧，州產碑材石，每使工琢之，與詞兼行，磨礱而成，常心使用者不可勝數。斯碑也，終山之窮僻，得之於自然。……公神而珍之，精選所處，湖州無稱立。罷守迴朝，載而途卜出蘇臺，入毗陵，亦無稱

⑬⓪ 本段主要根據崔倬，〈石幢敘〉，收入董誥等編，《全唐文》，卷759，頁7880-7881。又，崔倬此文撰於大中五年（851）正月一日，可知石幢的修復必在稍前的大中四年年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立。轉丹陽，遊建業，亦無稱立。次江州，州南有湖，湖東有山……神祠曰祖將軍廟在焉。公覩其詭秀，與碑材叶……手勒斯碑而立之。……後典州吏，於州之九江驛，有修坯之勞，狀其末績，乃取斯碑，刻公之述，實己之述，今為九江驛之碑焉。[131]

歐陽詹聽聞此碑原石產自湖州，係顏真卿刺湖時以境中絕美石材打造，因此極為珍惜，定欲尋得足當其質之處所，才甘願書刻安置。結果據傳魯公在湖州始終沒找到鍾意之地，由是在罷任後攜石而行，中間歷經蘇、常、潤諸州，終在江州州南發現倚山臨湖、景緻「詭秀」足「與碑材叶」的祖將軍廟，終心滿意足地「手勒斯碑而立之」——這整段描述，正與後來《廣川書跋》稱魯公晚年研發出的「載石以行」、「遇事以書」之行事相吻合，雖不知是否有將個案誇大為普遍的問題，總之似非空穴來風。而歐陽詹顯然對魯公的用心巧製欽佩不已，是以即便無緣親見碑拓，仍信誓旦旦宣稱其必是兼有文、書、地三種「天下最」的絕代之碑，然這樣一方本當「相持萬古」的碑石，居然遭庸人拿去重製改鐫一己微績，豈非「可悲之甚」！[132]

類似祖將軍廟碑這樣在中晚唐即遭人為蓄意破壞的魯公刻石，為數肯定不少——前舉在安史亂間一度被毀的平原二碑，還有在會昌法難被鑿壞的〈八關齋會報德記〉，即均屬此類；另外還有一些是因為沒能獲得妥善維護，很快就消失在世人視野之中。近年重被發現的〈修梁吳興太守柳惲西亭記〉碑就是如此。此碑的鐫刻文字儘管一直有流傳，但過去不僅從未見過拓本，連歷代金石著錄都不曾提及，不意晚近殘碑竟又現蹤（圖11）。[133] 學者從殘碑碑陰刻字遠較碑陽清晰，且點畫飽滿帶鋒芒等特色（圖12），推斷是碑可能刻立不久就倒覆進旁邊的苕溪，碑陰面仆入淤泥，讓刻字得以保存在

---

[131] 歐陽詹，〈弔九江驛碑材文〉，收入董誥等編，《全唐文》，卷598，頁6051-6052。

[132] 歐陽詹甚至在文末連用四個句子，形容該郡吏之舉無異是「去蘭室而居鮑肆，捨牢醴而食糟糠，脫錦繡而服枲麻，黜諸夏而即夷狄」，厭惡之情溢於言表，見歐陽詹，〈弔九江驛碑材文〉，收入董誥等編，《全唐文》，卷598，頁6052。

[133] 此碑的出土亦大有助對傳世文本之校訂，見氣賀澤保規，〈新発見唐代顔真卿撰書「西亭記碑」の理解とその歴史的意義〉，頁297-301；郭永秉，〈「夜魚春躍」與「間緝之心」——《梁吳興太守柳惲西亭記》讀後〉，《中國書法》，2020年11期，頁141-14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接近原樣的狀態，相對的，面朝河水的碑陽則因長期受到水流沖刷，以致其上刻字呈現甚為明顯的侵蝕。[134] 此碑的重出對於顏書研究者當然是意想不到的大福音，但也提醒我們，若非有心人的刻意照護，魯公石刻連在他離世不久的中晚唐都很難續存，遑論傳之千古。

正因有以上情況，讓不少對顏真卿個人及書迹懷抱敬意與溫情的中晚唐士人興起強烈的感慨及危機意識，他們或撰文抒發自己的哀嘆與弔念，又或直接訴諸行動嘗試挽救。本節所論諸例，還只限於在原件石刻所在地的重修行動，實際上還有其他可能選項，比如致力承傳石刻拓片、或將原件複本移轉到其他載體，又或攜往其他地方鐫立，[135] 乃至從新鐫立的翻刻石刻發展出獨立的拓本傳承系統[136] 等等。今天之所以還能看到為數頗豐的顏真卿石刻作品，進而將之作為分析顏書風格的核心參照，無疑就跟始自中晚唐人的努力息息相關。當然，在感念其貢獻的同時亦當指出，早從北宋開始，即有坐擁

[134] 薛龍春，〈名稱、書寫及環境所塑造的風格——圍繞浙大藏顏真卿殘碑的三個問題〉，頁135。

[135] 一個兼具上述所有作法的時代稍晚例子，可見鐫刻於南宋初蜀地的〈干祿字書〉碑。據活躍於兩宋時期的句詠記載，是時蜀地流通的〈干祿字書〉主要是木刻本，其字形和石刻書迹存在頗大出入，「鮮得其真」，至紹興十二年（1142），出知潼州府的宇文時中得知此事，遂提供他先前刺湖時（1136–1138）蒐集到的「魯公所書」及「楊漢公所摹」兩種〈干祿字書〉拓本，與蜀地通行本互校，並命「通顏書之士摹勒刻石」，遂成後來所謂的〈干祿字書〉蜀本。見句詠，〈干祿字書後記〉，收入董斯張等輯，《吳興藝文補》（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臺南：莊嚴文化，1997），卷17，頁24-25。宇文時中的湖州任期，見談鑰纂修，《嘉泰吳興志》，卷14，〈郡守題名〉，頁4783。

[136] 如〈大唐中興頌〉除在湖南省永州市浯溪留有原刻石，至少還可在江西省九江市秀峰山、四川省內江市資中縣東岩、四川省廣元市劍閣縣鶴鳴山三地見到翻刻石刻，且經學者比對，可確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現藏的〈大唐中興頌〉拓本，當源自南宋翻刻的四川劍閣鶴鳴山本，而非永州浯溪原本，詳細討論參見張達志、李睿詩，〈《大唐中興頌》的翻刻與肅宗中興的繼絕〉，《學術月刊》，2024年12期，頁159-164。此篇研究承蒙林聖智先生賜知，特此致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原碑拓本的藏家批評重修後的書迹已和原件存在相當落差，[137] 另也不乏有心人士打著修復口號，製造出一些看來疑點重重的魯公石刻。[138] 但若暫且跳出辨偽學框架，轉從石刻自身的生成過程重新審視這批咸被歸於魯公名下的富饒遺產，即會發現，即便它們未必能真切反映顏體本貌，然對理解魯公石刻之創制機制與脈絡，仍具有深刻的價值與意義。

結語：從石刻史角度重思顏真卿

在現今猶有流傳的晉唐書迹中，顏真卿作品群無疑是極為醒目的存在，因為無論從數量抑或分布來說，其在入宋以前基本上都罕有人比，二者兼具者又當推魯公為最。關於顏真卿書迹的這兩大特色，其實自北宋即然，且當時不僅傳世墨跡眾多，連石刻書迹也甚可觀，從而引起眾金石藏家暨學者注意。朱長文《墨池編》即曾言魯公「碑刻遺迹存者最多，而荒郊廢冢，其出未已」；歐陽脩則在《集古錄跋尾》提出相似觀察，並以魯公有意使其字迹傳之長久，因此多用「鉅書深刻」或「託於山崖」的書石方式在其所到之處留下遺蹟，故「今處處有之」，嘗試對此現象進行解釋。[139] 筆者以為，歐陽脩的回答誠然敏銳，但也觸發了一些連帶問題：何以能像魯公這般大範圍留下石刻書迹的人如此有限？魯公究竟是在怎樣的脈絡下進行石刻創制？他所造出的為數空前石刻，在內容和製法上是否有特別之處？這一大批作品問世後又在中晚唐歷經怎樣對待，致能大量留存至北宋？

---

[137] 歐陽脩對楊漢公重修〈干祿字書〉的批評即是一例，見氏著，《集古錄跋尾》，卷7，〈唐干祿字樣摹本〉，頁13。方令光甚至認為今日尚存的顏楷作品只有十件是真蹟，見其〈干祿之心、經世之書：顏真卿（709-785）楷書考論〉，頁285。惟方氏對部分作品的辨偽論證環節後來又有調整，見其〈〈顏勤禮碑〉、〈顏家廟碑〉真偽考〉，《故宮學術季刊》，38卷1期（2020），頁1-58。

[138] 如本文圖8的〈清遠道人遊虎丘詩〉，其中所見的魯公結銜和書刻時間對不上，因此被研究者斷為「偽迹」，見朱關田，〈顏真卿書迹著錄考略〉，頁165。

[139] 分見朱長文纂輯，何立民點校，《墨池編》，卷9，〈品藻四・續書斷・神品三人〉，頁276。歐陽脩，《集古錄跋尾》，卷8，〈唐湖州石記〉，頁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對於這一連串問題，本文首先借助過往較罕見於顏真卿研究中的制度史視角，提供可能的理解線索。筆者以為，顏真卿所以能夠如此大範圍地在唐帝國境內留下石刻，其一大背景實源自唐代官員遷轉制度設計所造成的「宦遊」現象。由於唐代朝廷繼承了隋代的「廢鄉官」，要求所有流內官都必須前往京城參與銓選，並在「本籍迴避」制度的規範下，將大量官員派往故里以外之地服務，從而導致「因宦而遊」成為唐代文官極為普遍的經驗——且經常是長距離。而此經驗在顏真卿身上又更特殊，因為魯公擁有異常多任且漫長的地方服務經驗，也因此能有機會較絕大多數同僚行經更大片唐土。這實與其前順後躓的仕宦軌迹有關。魯公早年官宦甚順遂，基本依循當時最理想的升官路徑前行，是以很早就突破了制約著泰半官僚發展的「守選」制，邁入得以無縫累積官宦的階段，但就在魯公跨越此難得門檻不久，即開始由於剛正不阿的性格屢屢觸怒執政，落得職涯後半不斷遭受懲罰性外放，終成就其既多且長的地方「宦遊」閱歷。

本文主張，顏真卿的豐富地方「宦遊」，正是他所以能大範圍地在唐帝國境內留下諸多石刻書迹的前提。惟在提出此解釋後，筆者也意識到在有唐一代，如魯公這般長期在地方流轉的文官仍頗有一些，卻沒有誰能像他留下如此驚人的石刻數量，顯示僅從制度面向切入並不足夠，還有必要結合魯公個人特點一併考慮。職是之故，本文接著就轉向魯公創制宦遊石刻的諸脈絡，嘗試觀察其中是否存在特有作法。通覽過後，筆者發現一饒富趣味的現象：魯公固然如同此前的書碑名手（如李邕）憑藉著善書令譽在宦遊途中獲得諸多受邀書石機會，從而令其石刻書迹——無論是以碑版、柱幢，抑或摩崖形式——得以遍布行經之地，乃至擴散其外，但他實有為數更多的宦遊碑刻是出於自己的主動興造，且主題、形制均相去頗遠，大抵如朱長文所言，魯公「碑刻雖多，而體製未嘗一也，蓋隨其所感之事、所會之興」，[140] 從而造就其宦遊碑刻在內涵上的空前多彩。

本文也嘗試從石刻史角度進一步把握顏真卿宦遊石刻的獨到面向。以既有的石刻分類為基礎，筆者將魯公宦遊石刻的主要面向區分成「敘政」、

[140] 朱長文纂輯，何立民點校，《墨池編》，卷9，〈品藻四・續書斷・神品三人〉，頁27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敘人」、「記事」、「佛教」、「道教」、「地方勝蹟」、「旅遊題名」、「旅遊題字」、「親族」、「藝文」十種大類，並指出魯公有相當部分的創制在過去較鮮見，如相對集中的「旅遊題名」、利用既存「藝文」作品榮顯「親族」、主動留意並探索當地「道教」遺存，乃至於涵蓋範圍更廣的「地方勝蹟」等，這當然不是說此前全無類似作品，但可確定，魯公是文獻所見最早以個人之姿創造出如此多元類型石刻的知名書家。結合前文言及「宦遊」對唐代文學的推動，和戶崎氏點出石刻內容有從「史學擴大到文學」之趨勢，的確可以認為魯公是較早透過書石方式將個人性的宦遊所感賦形之先驅，但也不宜忽視，此舉很大程度係與其企盼長留書迹的熱望相結合，是以可以看到，伴隨魯公書石經驗的漸豐，他也在開發出各種別具巧思的石刻製作方法之餘，逐步摸索出最適合呈現在石質媒材上的肥壯書風。

不過，即便顏真卿如此積極地在所到之處，力圖借助具有堅固耐久屬性的石質媒材盡可能地使其字迹傳之久遠，現實上仍沒這麼簡單。當代學者已清楚指陳，時至今日所以還能得見如此數量的魯公石刻書迹，實極仰賴對其書法推崇備至的宋代以降文人。本文則通過其他文獻資料，更進一步指出這樣的努力其實早在中晚唐即已出現。事實上，魯公石刻作品在他過世不久就開始面臨頗嚴峻的存續危機，原因不一而足，或者源自人為的蓄意破壞，又或由於後續的維護不力，以致遭到自然環境侵蝕等等。所幸，當時已有一批欽慕顏真卿人格及書法的有識之士，意識到魯公石刻乃是重要的物質文化遺產，是以設法通過各種辦法致力搶救、恢復與傳承其作品。儘管從較嚴格的文物保存標準看來，他們的付出並不總是盡如人意，但無疑為魯公石刻書迹得以可觀規模傳入北宋作出不容抹滅的貢獻。

總的來說，本文嘗試將構成顏真卿作品大宗的宦遊石刻視作一個物質性總體，設法從石刻史角度去把握其歷史意涵，並主張當我們立足於這樣的宏觀視角，就會赫然發現魯公的宦遊石刻在許多方面都具有很強的開先性，特別是他大幅提高了主動書立作品之比例，隨其所感、所會地盡情入石，是以不僅相當程度地突破既有的石刻創制框架，還在唐代特有的宦遊機制推動下，前所未見地於廣袤地景上留下一己書迹。這些作法無疑大大拓展了石刻原先具有的物質意涵，也為宋代以降的石刻創作者遺留下更加寬闊的依從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項。就此而言，魯公的宦遊石刻創制不僅在石刻史上別具意義，其紛呈多樣的實踐亦應足以作為宋代以降石刻文化研究的重要參照！

後記：本文初稿曾在2024年10月27日宣讀於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合辦的「跨域：隋唐帝國物質文化研究新取向」國際學術研討會，會間承蒙盧慧紋老師惠賜諸多重要洞見，寫作過程又得林聖智、張谷銘、陳雯怡、古怡青、涂宗呈、黃緯中、黃明理、黃方碩、黃子晏等老師學友及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修改建議，定稿階段更蒙集刊編輯、吳劉衍齊同學覆按註腳、書目等細項，讓拙文得進一步充實內容暨降低錯誤，謹此致上誠摯感謝。惟文中若有任何錯漏，仍由作者自負文責。

表3　顏真卿宦遊石刻總表

no	碑銘	撰寫時間	撰寫地	立/上石時間	立碑地	主被動	類別	現況	備註
1	張蘊仁德政碑	天寶元年（742）	醴泉縣	天寶元年（742）	醴泉縣	主動？	敘政	存目	
2	顏氏三典茲郡碑	平原任上	平原郡	754年前	平原郡	主動	親族；敘政	存目	據年譜補
3	同時臺省擢牧諸郡碑	平原任上	平原郡	754年前	平原郡	主動	敘政	存目	據年譜補
4	東方朔畫贊/碑陰記	天寶十三載（754）十二月	平原郡	撫州任上（768–771）	平原郡	主動	地方勝蹟；藝文	存拓	
5	馬承光碑	乾元元年（758）	蒲州	乾元元年（758）	？	被動？	敘政	存目	
6	請御書逍遙樓碑額表	乾元元年（758）	蒲州	乾元二年（759）	蒲州	被動	記事（御書）	存目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7	華山廟題名	乾元元年（758）十月	華山	乾元元年（758）十月	華山	主動	旅遊題名	存拓，碑	
8	鮮于氏離堆記	乾元三年（760）八月	閬州	寶應元年（762）五月	閬州	主動	敘人	存拓	
9	東林寺題名	永泰二年（766）七月	江州	永泰二年（766）七月	江州廬山	主動	旅遊題名	存文	
10	西林寺題名	永泰二年（766）七月	江州	永泰二年（766）七月	江州廬山	主動	旅遊題名	存文	
11	鮮于仲通碑	大曆二年（767）？	吉州	大曆二年（767）正月	閬州	被動	敘人（墓碑誌）	存文	
12	靖居寺題名	大曆二年（767）十月	吉州	大曆二年（767）十月	吉州	主動	旅遊題名	存文	
13	祖關二字	大曆二年（767）十月	吉州	大曆二年（767）十月	吉州	主動	旅遊題字	存目	
14	橋仙觀碑記	大曆四年（769）正月	撫州	大曆四年（769）正月	撫州	主動	道教	存文	
15	魏夫人仙壇碑	大曆四年（769）三月	撫州	大曆四年（769）三月	撫州	主動	道教	存文	
16	華姑仙壇碑	大曆四年（769）三月	撫州	大曆四年（769）三月	撫州	主動	道教	存文	
17	寶應寺翻經臺記	大曆四年（769）	撫州	大曆四年（769）	撫州	被動	佛教	存文	
18	顏允南碑	大曆四年（769）？	撫州	大曆四年（769）四月	長安	主動	親族	存文	
19	顏喬卿碑	大曆四年（769）？	撫州	大曆四年（769）四月	長安	主動	親族	存目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0	顏幼輿碑	大曆四年（769）？	撫州	大曆四年（769）四月	長安	主動	親族	存文	
21	顏允臧碑	大曆四年（769）？	撫州	大曆四年（769）四月	長安	主動	親族	存文	
22	顏真長碑	大曆四年（769）？	撫州	大曆四或五年（769或770）	洪州海昏	主動	親族	存目	
23	徐秀神道碑	大曆五年（770）年初	撫州	大曆五年（770）三月	長安	被動	敘人（墓碑誌）	存文	據年譜補
24	書馬伏波語	大曆五年（770）四月	撫州	大曆五年（770）四月	撫州	被動？	道教；藝文	存拓	
25	殷踐猷墓碣	大曆五年（770）五月	撫州	大曆五年（770）五月	河南新安	主動	親族	存文	母家
26	殷攝墓碣	大曆五年（770）五月	撫州	大曆五年（770）五月	河南新安	主動	親族	存目	母家
27	張景佚清德碑	大曆五年（770）	撫州	大曆五年（770）	撫州	主動	敘政；親族	存目	魯公姑表兄弟
28	元子哲遺愛碑	大曆五年（770）	撫州	大曆五年（770）	撫州	主動	敘政	存目	
29	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	大曆六年（771）三月	撫州	大曆六年（771）三月	撫州	被動	佛教	存文	
30	麻姑山仙壇記	大曆六年（771）四月	撫州	大曆六年（771）四月	撫州	主動	道教	存拓	
31	大唐中興頌	大曆六年（771）六月	撫州	大曆六年（771）六月	永州祁陽	被動	敘政	存拓，石	
32	千金陂記	撫州任上	撫州	撫州任上	撫州	主動	敘政	存目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33	臧懷恪碑	撫州任上	撫州	大曆七年（772）	長安	被動	敘人（墓碑誌）	存拓，石	
34	臧氏糾宗碑	疑撫州任上	撫州	疑湖州任上	京兆三原	被動？	敘人（墓碑誌）	存文	
35	臧氏故宅碑	疑撫州任上	撫州	疑湖州任上	京兆三原	被動？	敘人（墓碑誌）	存目	
36	涇縣碑	大曆六年（771）	宣州	大曆六年（771）	宣州	？	？	存目	
37	寧國題名	大曆六年（771）	宣州	大曆六年（771）	宣州	主動	旅遊題名	存目	
38	刻清遠道士詩	大曆六年（771）	蘇州	大曆六年（771）	蘇州	主動	藝文	存拓	
39	玄妙觀老君贊	大曆六年（771）	蘇州	大曆六年（771）	蘇州	？	道教	存目	
40	顏含大宗碑	大曆六年（771）？	潤州	大曆六年（771）十一月	潤州白下	主動	親族	存文	
41	顏含碑	大曆七年（772）四月	潤州	大曆七年（772）四月	潤州白下	主動	親族；藝文	存文	
42	書李白誌公像贊	大曆七年（772）	潤州	大曆七年（772）	潤州	主動	藝文	存目	
43	玄武湖記	大曆七年（772）	潤州	大曆七年（772）	潤州	？	地方勝蹟？	存目	
44	顏默碑	大曆七年（772）？	潁州	大曆七年（772）四月	潁州	主動	親族；藝文	存目	
45	八關齋會報德記	大曆七年（772）五月	宋州	大曆六年（772）五月？	宋州	被動	佛教；敘政	存拓	
46	開元寺僧碑	大曆七年（772）	汴州	大曆七年（772）	汴州	？	佛教	存目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47	宋璟碑	大曆七年（772）九月	洛陽	大曆七年（772）九月	邢州沙田	被動	敘人（墓碑誌）	存拓	
48	文殊師利菩薩碑	大曆八年（773）十月？	湖州	大曆八年（773）十月？	湖州	主動	敘政；佛教	存目	
49	沈氏述祖德碑陰記	大曆八年（773）十二月	湖州	大曆八年（773）十二月	湖州	被動	敘人（墓碑誌）；親族	存文	姻親沈怡立
50	干祿字書	大曆九年（774）正月	湖州	大曆九年（774）正月	湖州州廳	主動	親族	存拓	
51	乞題放生池額表暨碑陰記	大曆九年（774）正月	湖州	大曆九年（774）正月	湖州駱駝橋東	主動	記事（御書）	存拓	
52	杼山妙喜寺碑	大曆九年（774）三月	湖州	大曆九年（774）三月	湖州	被動	記事；佛教	存文	
53	乞御書題額恩敕批答碑陰記	大曆九年（774）七月	湖州	大曆九年（774）八月	湖州駱駝橋東	主動	記事（御書）	存拓	
54	顏杲卿神道碑	大曆九年（774）	湖州	大曆九年（774）	長安祖墳	主動	親族	存文	
55	橫山廟碑	大曆九年（774）	湖州	大曆九年（774）	湖州烏程	主動	地方文史？	存殘文	
56	歐陽使君神道碑	大曆十年（775）十月	湖州	？	鄭州滎澤	被動	敘人（墓碑誌）	存文	
57	康希銑神道碑	大曆十一年（776）	湖州	大曆十二年（777）	越州	被動	敘人（墓碑誌）	存文	姻親康元瑰請
58	修梁吳興太守柳惲西亭記	大曆十二年（777）三月	湖州	大曆十二年（777）三月	湖州	主動	敘政	存文，殘碑	
59	射堂記	大曆十二年（777）	湖州	大曆十二年（777）四月	湖州	主動	地方勝蹟	存目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60	項王碑陰述	大曆十二年（777）	湖州	大曆十二年（777）五月	湖州	主動	地方勝蹟	存殘文	
61	李玄靖（含光）碑	大曆十二年（777）	湖州	大曆十二年（777）五月	茅山	被動	道教	存拓	
62	湖州石柱記	大曆十二年（777）前	湖州	大曆十二年（777）	湖州	主動	地方勝蹟	存殘文	
63	謝公碑陰記	湖州任上	湖州	湖州任上	湖州	主動	地方勝蹟	存殘文	
64	祖亭之碑	大曆十二年（777）	江州	大曆十二年（777）	江州	主動	地方勝蹟	存目	
65	殷夫人墓誌	湖州任上	湖州	大曆十二年（777）	洛陽	主動	親族	存拓	魯公伯母

說明：本表主要徵集自朱關田《顏真卿書法全集（珍藏版）》中的作品總目錄和〈顏真卿書迹著錄考略〉，另有小部分（編號2、3、23）不見傳世著錄，然《顏真卿年譜》曾引史料提及，一併置入。

（責任編輯：陳卉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王世貞
《弇州山人四部稿》，明代論著叢刊本，臺北：偉文圖書公司，1976。
王象之編
《輿地碑記目》，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24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據粵雅堂叢書本影印。
永瑢等撰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
朱長文纂輯；何立民點校
《墨池編》，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
西泠印社編
《宋拓本顏真卿書忠義堂帖》，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1994。
杜甫著；謝思煒校注
《杜甫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佚名
《寶刻類編》，收入《歷代碑誌叢書》，第1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據粵雅堂叢書本影印。
佚名撰；范紅娟點校
《宣和書譜》，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1。
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
《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
封演撰；趙貞信校注
《封氏聞見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5。
范曄撰
《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
皎然
《杼山集》，四庫唐人文集叢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陳振孫著；徐小蠻、顧美華點校
《直齋書錄題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陸增祥編
《八瓊室金石補正》，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6-8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據民國甲子年吳興劉氏希古樓刊本影印。
陸贄著；王素點校
《陸贄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黃本驥輯
《顏魯公集》，四部備要本，上海：中華書局，1936，據三長物齋叢書本校刊影印。
董逌
《廣川書跋》，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
董斯張等輯
《吳興藝文補》，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臺南：莊嚴文化，1997。
董誥等編
《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7。
趙明誠撰；金文明校證
《金石錄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19。
劉昫撰
《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
歐陽脩、宋祁撰
《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
歐陽脩
《集古錄跋尾》，收入《歷代碑誌叢書》，第1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據清槐廬叢書本影印。
歐陽棐
《集古錄目》，收入《歷代碑誌叢書》，第1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據清槐廬叢書本影印。
蔡絛
《鐵圍山叢談》，叢書集成初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3。
談鑰纂修
《嘉泰吳興志》，收入《宋元方志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0，據宋嘉泰元年纂、民國三年吳興叢書本影印。
鄭元慶箋釋
《石柱記箋釋》，北京：中華書局，1985。
蕭統編
《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嚴可均校輯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1。
蘇軾
《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近人論著

于書亭
2004 《鄭道昭與四山刻石》，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
Yu, Shuting
2004 *Zheng Daozhao yu sishan keshi* (Zheng Daozhao and the Four Mountains Inscriptions), Beijing: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方令光
2016 〈干祿之心、經世之書：顏真卿（709-785）楷書考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2020 〈〈顏勤禮碑〉、〈顏家廟碑〉真偽考〉，《故宮學術季刊》，38卷1期，頁1-58。
Fang, Ling-kuang
2016 "Ganlu zhi xin, Jingshi zhi shu: Yan Zhenqing (709–785) kaishu kaolun (The Heart for Officialdom, the Book for Governance: A Study of Yan Zhenqing's Regular Script (709–785)," Ph.D. dissertation,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2020 "A Study on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Yan Qinli Stele and Yan Family Temple Stele,"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Research Quarterly*, vol. 38, no. 1, pp. 1–58.
王木鐸
2005 〈新出土顏真卿早期書作《王琳墓志》及其意義〉，《中國書法》，8期，頁61-68。
Wang, Muoduo
2005 "Xin chutu Yan Zhenqing zaoqi shuo zuo "Wang Lin Muzhi" ji qi yiyi (The Newly Unearthed Early Calligraphy Work of Yan Zhenqing: The "Wang Lin Epitaph" and Its Significance)," *Chinese Calligraphy*, no. 8, pp. 61–68.
王勛成
2021 《唐代銓選與文學》，北京：中華書局。
Wang, Xuncheng
2021 *Tangdai quanxuan yu wenxue* (Official Selection and Literature in the Ta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王壽南
1977 〈唐代文官任用制度之研究〉，收入氏著，《唐代政治史論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頁135-234。
Wang, Shou-nan
1977 "Tangdai wenguan renyong zhidu zhi yanjiu (A Study on the Civil Official Appointment System in the Tang Dynasty)," in Wang Shounan, *Tangdai zhengzhi shi lunji* (Essays on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Tang Dynasty),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pp. 135–23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甘懷真
1995 〈唐代官人的宦遊生活——以經濟生活為中心〉，《第二屆唐代文化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學生書局，頁39-60。
2013 〈漢唐間的京城社會與士大夫文化〉，收入邱仲麟編，《中國史新論：生活與文化分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頁165-198。
Kan, Huai-chen
1995 “Tangdai guanren de huanyou shenghuo—yi jingji shenghuo wei zhongxin (The Roaming Life of Officials in the Tang Dynasty—with Focus on Economic Life),” *Di er jie Tangdai wenhua yantaohui lunwenji* (In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Tang Dynasty Culture Symposium), Taipei: Student Book CO., Ltd., pp. 39–60.
2013 “Han Tang jian de jingcheng shehui yu shidafu wenhua (Urban Society and Literati Culture between Han and Tang),” in Chiu Chung-lin ed., *Zhongguo shi xinlun: Shenghuo yu wenhua fen ce* (New Studies in Chinese History: Life and Culture Volume),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Company, pp. 165–198.
石雲濤
2003 《唐代幕府制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Shi, Yuntao
2003 *Tangdai mufu zhidu yanjiu* (Research on the Secretariat System of the Tang Dynasty),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朱天曙、程玉兒
2021 〈《忠義堂帖》與顏真卿書風在南宋的傳播〉，《書法教育》，6期，頁58-66。
Zhu, Tianshu, and Yuer Cheng
2021 ““Zhongyitang Tie” yu Yan Zhenqing shufeng zai Nansong de chuanbo (The “Zhongyi Hall Stele”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Yan Zhenqing’s Calligraphic Style in the Southern Song),” *Shufa Jiaoyu* (Calligraphy Education), no. 6, pp. 58–66.
朱關田
1988 〈李邕書法編年錄〉，收入氏著，《李邕》，北京：紫禁城出版社，頁29-39。
1992 《唐代書法考評》，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2008 《顏真卿年譜》，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
2020 〈傳世顏真卿楷書碑志著錄考略〉，《中國書法》，11期，頁51-83。
Zhu, Guantian
1988 “Li Yong shufa biannian lu (Chronological Catalogue of Li Yong’s Calligraphy),” in Zhu Guantian, *Li Yong*, Beijing: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pp. 29–39.
1992 *Tangdai shufa kaoping* (Assessment of Tang Dynasty Calligraphy), Hangzhou: Zhejiang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2008 *Yan Zhenqing nianpu*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Yan Zhenqing), Hangzhou: Xiling Yinshe Chubanshe (Xiling Seal Engraver’s Society Publishing Hous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020 “Chuan shi Yan Zhenqing kaishu beizhi zhulu kaolue (A Brief Study and Catalogue of the Extant Stele Inscriptions in Regular Script by Yan Zhenqing),” *Chinese Calligraphy*, no. 11, pp. 51–83.

朱關田主編

2019 《顏真卿書法全集（珍藏版）》，杭州：浙江攝影出版社。

Zhu, Guantian ed.

2019 *Yan Zhenqing shufa quanji* (*zhengcang ban*) (Complete Works of Yan Zhenqing’s Calligraphy [Deluxe Edition]), Hangzhou: Zhejiang Photography Press.

江吟、宋行標主編

2008 《王羲之書法全集》，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

Jiang, Yin, and Xingbiao Song eds.

2008 *Wang Xizhi shufa quanji* (Complete Works of Wang Xizhi’s Calligraphy), Hangzhou: Xiling Yinshe Chubanshe (Xiling Seal Engraver’s Society Publishing House).

江伯威、陳鍇生

2025 〈中國古代左行書迹考論——兼議顏真卿《大唐中興頌》〉，《中國書法》，6期，頁194-196。

Jiang, Bowei, and Kaisheng Chen

2025 “Zhongguo gudai zuo xing shuji kaolun—jian yi Yan Zhenqing “Da Tang Zhong Xing Song” (A Study of Left-Oriented Calligraphic Works in Ancient China—With a Discussion of Yan Zhenqing’s “Ode to the Restoration of the Great Tang”),” *Chinese Calligraphy*, no. 6, pp. 194–196.

何寄澎

1978 《總是玉關情：唐代邊塞詩初探》，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Ho, Chi-peng

1978 *Zongshi Yuguan qing: Tangdai biansai shi chutan* (Always Yearning for Jade Pass: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ang Frontier Poetry),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Company.

吳宗國

2010 《唐代科舉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Wu, Zongguo

2010 *Tangdai keju zhidu yanjiu* (Research on the Examination System of the Tang Dynast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吳修安

2021 〈唐宋時期南北交通幹道新探——江西區域視角的考察〉，《國學研究》，45卷，頁63-85。

Wu, Xiu-an

2021 “Tang Song shiqi nanbei jiaotong gandao xintan: Jiangxi quyu shijiao de kaucha (A New Study on the North–South Transportation Routes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Exami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Jiangxi Region)," *Guoxue Yanjiu* (Studies in Sinology), vol. 45, pp. 63–85.

呂慎華

1999 〈唐代任官籍貫迴避制度初步研究〉,《中興史學》, 5期，頁33-47。

Lu, Shen-hwa

1999 "Tangdai renguan jiguan huibi zhidu chubu yanjiu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Avoidance Rule for Official Appointments in the Tang Dynasty)," *Chung Hsing History*, no. 5, pp. 33–47.

李建崑

1999 〈論唐代元和時期流貶文人之行旅詩〉,《文史學報》, 29期，頁27-48。

Lee, Chien-kun

1999 "Lun Tangdai Yuanhe shiqi liubian wenren zhi xinglü shi (On the Traveling Poems of Exiled Literati in the Yuanhe Period of the Tang Dynasty)," *Wenshi Xuebao*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no. 29, pp. 27–48.

李斌城主編

2002 《唐代文化》,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Li, Bincheng ed.

2002 *Tangdai wenhua* (Culture of the Tang Dynasty),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李燕捷

1992 〈唐代後期內外官輕重辨〉,《社會科學戰線》, 4期，頁162-167。

Li, Yanjie

1992 "Tangdai houqi neiwai guan qingzhong bian (A Study on the Hierarchy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Officials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Social Science Front*, no. 4, pp. 162–167.

尚永亮

2009 《唐五代逐臣與貶謫文學研究》, 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Shang, Yongliang

2009 *Tang Wudai zhuchen yu bianzhe wenxue yanjiu* (Research on Exiled Officials and Literature of th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Wuhan: Wuhan University Press.

金瑩坤、于瑞

2014 〈唐代吏部平判入等科與選舉研究〉,《學術月刊》, 11期，頁141-153。

Jin, Yingkun, and Rui Yu

2014 "Studies on Imperial Examination of Fair Judgment Examination by Tang Dynasty Ministry of Civil Personnel," *Academic Monthly*, no. 11, pp. 141–153.

胡雲薇

2008 〈千里宦遊成底事，每年風景是他鄉——試論唐代的宦遊與家庭〉,《臺大歷史學報》, 41期，頁65-10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u, Yun-wei
2008 "Official Travel and the Family Life in Tang China," *Historical Inquiry*, no. 41, pp. 65–107.
胡寶國
2001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州郡地志〉,《中國史研究》,4期,頁13-25。
Hu, Baoguo
2001 "Weijin Nanbeichao Shiqi de Zhoujun Dizhi (Local Gazetteers during the Wei, Jin, and Northern–Southern Dynasties),"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ical Studies*, no. 4, pp. 13–25.
郁賢皓
2000 《唐刺史考全編》,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
Yu, Xianhao
2000 *Tang cishi kao quanbian* (Comprehensive Study on the Tang Dynasty Administrators), Hefei: Anhui University Press.
徐海容
2018 《唐代碑志文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Xu, Hairong
2018 *A Study on Monumental Inscriptions of the Ta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等編
2000 《俄藏敦煌文獻》,第1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et al. eds.
2000 *Dunhua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the St. Petersburg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of Russia*, vol. 15,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張國剛
1987 《唐代官制》,西安:三秦出版社。
1994 〈唐代階官與唐代職事官的階官化〉,收入氏著,《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論集》,臺北:文津出版社,頁207-232。
Zhang, Guogang
1987 *Tangdai guanzhi* (The Official System of the Tang Dynasty), Xi'an: San Qin Publishing House.
1994 "Tangdai jieguan yu Tangdai zhishi guan de jieguanhua (The Ranks of Tang Officials and the Ranking of Functional Offices)," in Zhang Guogang, *Tangdai zhengzhi zhidu yanjiu lunji* (Collected Studies o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the Tang Dynasty), Taipei: Wenjin Publishing CO., Ltd, pp. 207–232.
張達志、李睿詩
2024 〈《大唐中興頌》的翻刻與肅宗中興的繼絕〉,《學術月刊》,12期,頁159-17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Zhang, Dazhi, and Ruishi Li
2024 “The Recarving of Ode to the Restoration of the Great Tang Dynasty and The (Dis) Continuation of Suzong’s Restoration,” *Academia Monthly*, no. 12, pp. 159–176.
莊子薇
2014 〈從《忠義堂帖》看顏真卿於南宋之形象〉，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Chuang, Tzu-wei
2014 “Considering the Image of Yan Zhenqing in Southern Song from Zhong Yi Tang Tie,” M.A. thesis,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郭永秉
2020 〈「夜魚春躍」與「間緝之心」——《梁吳興太守柳惲西亭記》讀後〉，《中國書法》，11期，頁141-146。
Guo, Yongbing
2020 “‘Yeyu chun yue’ yu ‘jianji zhi xin’: “Liang Wuxing taishou Liu Yun Xiting Ji” duhou (‘The Spring-Leaping Fish at Night’ and the ‘Mind of Vigilance’: On West Pavilion Record by Liu Yun, Governor of Wuxing, Liang Dynasty),” *Chinese Calligraphy*, no. 11, pp. 141–146.
陳文妍
2024 〈顏真卿《麻姑仙壇記》對壽神形象之接受與再塑〉，《中華書道》，124期，頁38-47。
Chen, Wenyen
2024 “Yan Zhenqing “Maguxiantan Ji” dui Shoushen xingxiang zhi jieshou yu zaishu (The Reception and Remolding of the Longevity Deity’s Image in Yan Zhenqing’s Inscription at the “Magu Immortal Altar”),” *Zhong hua shu dao* (Chinese Calligraphy), no. 124, pp. 38–47.
陳尚君
2016 〈鄭虔墓誌考釋〉，收入氏著，《貞石詮唐》，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頁207-232。
Chen, Shangjun
2016 “Zheng Qian muzhi kaoshi (A Study and Textual Collation of the Epitaph of Zheng Qian),” in Chen Shangjun, *Zhenshi quan Tang* (Collected Stone Inscriptions of the Tang),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pp. 207–232.
陳垣
1988 《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
Chen, Yuan
1988 *Daojia jinshi lue* (A Brief Account of Daoist Epigraphy),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陳惠芬
2008 〈唐代題名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Chen, Huifen
2008 “Tangdai Timing Yanjiu (Research on Tang Dynasty Inscriptions),” M.A. thesi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程喜霖
2000 《唐代過所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Cheng, Xilin
2000 *Tangdai guosuo yanjiu* (Research on Safe-Conduct Passes in the Ta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華林甫
2007 〈隋唐《圖經》輯考（上）〉，《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27期，頁141-213。
Hua, Lin-fu
2007 “Sui Tang Tujing Ji Kao (Shang) (A Critical Study on the Sui–Tang Period Topographical Records, Part I),” *The Journal of History, NCCU*, no. 27, pp. 141–213.
楊化坤
2019 〈元結撰、顏真卿書〈大唐中興頌〉碑主旨新探〉，《東吳中文學報》，38期，頁23-35。
Yang, Hua-kun
2019 “The New Exploration on the Theme of the Stele of Datang Zhongxing Song,” *Soochow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o. 38, pp. 23–35.
楊承祖
1963 〈元結年譜〉，《淡江學報》，2期，頁25-69。
Yang, Cheng-tsu
1963 “Yuan Jie nianpu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Yuan Jie),” *Tamkang Xuebao* (Tamkang Journal),” no. 2, pp. 25–69.
楊殿珣
1940 《石刻題跋索引》，北京：商務印書館。
Yang, Dianxun
1940 *Shike tibao suoyin* (Index to Stone Inscriptions and Colophon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葉國良
2011 《宋代金石學研究》，臺北：臺灣書房。
Yeh, Kuo-liang
2011 *Songdai jinshi xue yanjiu* (Epigraphic Studies in the Song Dynasty), Taipei: Taiwan Bookstore Publishing Co.
雷聞
2009 《郊廟之外：隋唐國家祭祀與宗教》，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Lei, Wen
2009 *Jiaomiao zhi wai: Sui Tang guojia jisi yu zongjiao* (Beyond State Temples: State Sacrifices and Religion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廖宜方
2011 《唐代的歷史記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
Liao, Yi-fang
2011 *The Historical Memories in Tang China*,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趙超
2023 《中國古代石刻概論（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
Zhao, Chao
2023 *Zhongguo gudai shike gailun (zengdingben)* (An Introduction to Ancient Chinese Stone Inscriptions, Revised Editio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劉正成主編
1991-2003 《中國書法全集》，北京：榮寶齋出版社。
1993 《中國書法全集25・顏真卿1》，北京：榮寶齋出版社。
1996 《中國書法全集23・李邕》，北京：榮寶齋出版社。
Liu, Zhengcheng ed.
1991-2003 *Zhongguo shufa quanji* (Complete Works of Chinese Calligraphy), Beijing: Rongbaozhai Publishing House.
1993 *Zhongguo shufa quanji 25: Yan Zenqing 1* (Complete Works of Chinese Calligraphy 25: Yan Zenqing 1), Beijing: Rongbaozhai Publishing House.
1996 *Zhongguo shufa quanji 23: Li Yong* (Complete Works of Chinese Calligraphy: Li Yong), Beijing: Rongbaozhai Publishing House.
劉后濱
2019 〈宦途八俊：中晚唐精英的仕宦認同及其制度路徑〉，《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56卷6期，頁93-103。
Liu, Houbin
2019 “Eight Groups of Key Official Positions: the Elites’ Identity of Officialdom and its Institutional Channel in the Middle and Late Tang Dynasty,”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56, no. 6, pp. 93–103.
劉淑芬
1997 〈經幢的形制、性質和來源——經幢研究之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8本3分，頁643-786。
Liu, Shu-fen
1997 “The Form, Nature, and Origins of Dharani Pillars Studies on Dharani Pillars, Part II,”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vol. 68, no. 3, pp. 643–78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劉詩平

1996 〈唐代前後期內外官地位的變化——以刺史遷轉途徑爲中心〉,《唐研究》,2期,頁325-345。

Liu, Shiping

1996 "Tangdai qianhouqi neiwai guan diwei de bianhua: yi cishi qianzhuan tujing wei zhongx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tatus between Interior and Frontier Officials in the Early and Late Tang Dynasty: Centering on the Transfer Routes of Prefectural Governors)," *Journal of Tang Studies*, no. 2, pp. 325–345.

潘猛补

2014 〈《忠義堂帖》與温州——兼論〈自書告身〉真偽〉,《圖書館雜志》,2期,頁105-108、25。

Pan, Mengbu

2014 *"Zhong Yi Tang Tie* and Wenzhou: A Discussion About the Authenticity of Yan Zhenqing's *Copybook Letter of Attorney Written by Myself*," *Library Journal*, no. 2, pp. 105–108, 25.

鄭雅如

2010 〈「中央化」之後——唐代范陽盧氏大房寶素系的居住形態與遷移〉,《早期中國史研究》,2卷2期,頁1-65。

Cheng, Ya-ju

2010 "After "Centralization": The Inhabitation and Migration of the Fan-yang Lu Family Paosu fang (范陽盧氏寶素房) in Tang China," *Early and Medieval Chinese History (EMCH)*, vol. 2, no. 2, pp. 1–65.

賴瑞和

2006 〈論唐代的檢校官制〉,《漢學研究》,24卷1期,頁175-208。

2008 《唐代基層文官》,北京:中華書局。

2011 《唐代中層文官》,北京:中華書局。

Lai, Swee-fo

2006 "On the *Jianjiao* Titles Under the Tang Dynasty," *Chinese Studies*, vol. 24, no. 1, pp. 175–208.

2008 *Tangdai jiceng wenguan* (Grassroots Officials of the Ta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1 *Tangdai zhongceng wenguan* (Middle-Level Officials of the Ta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戴山青編

1992 《王獻之書法全集》,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

Dai, Shanqing ed.

1992 *Wang Xianzhi shufa quanji* (Complete Works of Wang Xianzhi's Calligraphy), Beijing: Beijing Guangbo Xueyuan Chubanshe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薛龍春
2020 〈名稱、書寫及環境所塑造的風格——圍繞浙大藏顏真卿殘碑的三個問題〉，《中國書法》，11期，頁126-140。
Xue, Longchun
2020 “Mingcheng, shuxie ji huanjing suo suzhao de fengge—weirao Zheda cang Yan Zhenqing canbei de san ge wenti (Naming, Writing, and Environmental Style: Three Issues Concerning Yan Zhenqing’s Fragmentary Stele in the Zhejiang University Collection),” *Chinese Calligraphy*, no. 11, pp. 126–140.
羅昌繁
2023 〈北宋石刻題名的常與變——兼論石刻題名的唐宋轉型〉，《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期，頁101-112。
Luo, Changfan
2023 “The Normality and Abnormality of Stone Inscriptions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Also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tone Inscriptions During the Tang-Song Period,” *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no. 1, pp. 101–112.
嚴杰
2005 《顏真卿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Yan, Jie
2005 *Yan Zhenqing pingzhuan* (A Critical Biography of Yan Zhenqing),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戶崎哲彥
2014 《唐代嶺南文學與石刻考》，北京：中華書局。
Tosaki, Tetsuhiko
2014 *Tangdai Lingnan wenxue yu shike kao* (Studies on the Literature and Inscriptions of Lingnan in the Ta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吉川忠夫
2019 《顏真卿伝：時事はただ天のみぞ知る》，京都：法藏館。
Yoshikawa, Tadao
2019 *Gan Shinkei den: Jiji wa tada ten nomizo shiru* (Biography of Yan Zhenqing: Only Heaven Knows the Truth of Events), Kyoto: Hozokan.
池田溫
1975 〈沙洲圖經略考〉，收入榎博士還曆記念東洋史論叢編纂委員會編，《榎博士還曆記念東洋史論叢》，東京：山川出版社，頁31-101。
Ikeda, On
1975 “Sashū zukei ryakkō (A Brief Study of the Topographical Account of Shazhou),” in Enoki hakushi kanreki kinen tōyōshi ronsō hensan iinkai (Committee for the Compilation of the Oriental History Essays in Honor of Dr. Enoki’ s Kanreki) ed., *Studies in Asia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istory Dedicated to Prof. Dr. Kazuo Enoki on His Sixtieth Birthday, Tokyo: Yamakawa Shuppansha Ltd., pp. 31–101.

辻正博

1991 〈唐代貶官考〉,《東方學報》,63期,頁265-390。

Tsuji, Masahiro

1991 "A Study on the Demotion of Mandalins in T'ang Dynasty,"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no. 63, pp. 265–390.

岩崎日出男

1993 〈不空三蔵の五臺山文殊信仰の宣布について〉,《密教文化》,181期,頁40-57。

Iwasaki, Hideo

1993 "On the Missionary Work of Mt. Wutai Bodhisattva Mañjusri by Amoghavajra," *Mikkyō Bunka*, no. 181, pp. 40–57.

氣賀澤保規

2023 〈新発見唐代顔真卿撰書「西亭記碑」の理解とその歴史的意義〉,收入氏編,《論集隋唐仏教社会とその周辺》。東京:汲古書院,頁293-321。

Kegasawa, Yasunori

2023 "Shinhakken Todai Gan Shinkei sensho 'Seiteikibi' no rikai to sono rekishiteki igi (Understanding the Newly Discovered Stone Inscription 'Xiting Ji' by YAN Zhenqing and its Historical Importance)," in Yasunori Kegasawa ed., *A Collection of Academic Papers on Buddhist Society in the Sui-Tang Period and Some Related Problems*, Tokyo: Kyūko Shoin, pp. 293–321.

濱口重國

1966 〈所謂、隋の郷官廃止に就いて〉,收入氏著,《秦漢隋唐史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頁770-786。

Hamaguchi, Shigenori

1966 "Iwayuru Zui no kyokan haishi ni tsuite (On the Abolition of Village Officials in the Sui Dynasty)," in Shigenori Hamaguchi, *Shin Kan Zui Tōshi no kenkyū*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Qin, Ha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pp. 770–786.

Harrist, Robert E.

2008 *The Landscape of Words: Stone Inscriptions from Early and Medieval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McNair, Amy

1998 *The Upright Brush: Yan Zhenqing's Calligraphy and Song Literati Politic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Nugent, Christopher M. B.

2010 *Manifest in Words, Written on Paper: Producing and Circulating Poetry in Tang Dynasty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網路論文與資料庫

故宮典藏資料檢索
https://digitalarchive.npm.gov.tw/（檢索日期：2025年3月8日）。
北京故宮博物院官網
https://www.dpm.org.cn/（檢索日期：2025年11月7日）。
開放博物館
https://openmuseum.tw/（檢索日期：2025年11月7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版出處

圖1 「顏真卿現存石刻書迹分布（附李邕）」。作者自行用QGIS軟體繪製，分布資訊參考自劉正成主編，《中國書法全集23．李邕》（北京：榮寶齋出版社，1996）；劉正成主編，《中國書法全集25．顏真卿1》（北京：榮寶齋出版社，1993）；朱關田，〈李邕書法編年錄〉，收入氏著，《李邕》（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8），頁29-39；朱關田，〈顏真卿書迹著錄考略〉，收入氏編，《顏真卿書法全集（珍藏版）》（杭州：浙江攝影出版社，2019），第8卷，頁134-212。

圖2 〈東方朔畫贊並碑陰記〉民國拓本。取自朱關田，〈傳世顏真卿楷書碑志著錄考略〉，《中國書法》，2020年11期，頁60。

圖3 〈華山廟題名〉拓本。取自劉正成主編，《中國書法全集25．顏真卿1》，圖版6，頁76。

圖4 〈麻姑仙壇記〉宋拓本（局部）。取自北京故宮博物院官網：https://www.dpm.org.cn/collection/impres/234172.html（檢索日期：2025年11月7日）。

圖5 〈大唐中興頌〉拓本。取自朱關田，〈傳世顏真卿楷書碑志著錄考略〉，頁70。

圖6 〈八關齋會報德記〉拓本。取自「開放博物館」線上資料庫：https://openmuseum.tw/muse/digi_object/6142b0a85faaa3338527715bb7bc49b2（檢索日期：2025年11月7日）。

圖7 〈干祿字書〉拓本。取自朱關田，〈傳世顏真卿楷書碑志著錄考略〉，頁82。

圖8 〈清遠道人遊虎丘詩〉拓本。取自西泠印社編，《宋拓本顏真卿書忠義堂帖》（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1994），頁122-123。

圖9 〈乞御書天下放生池碑額表〉拓本。取自西泠印社編，《宋拓本顏真卿書忠義堂帖》，頁289-292。

圖10 〈乞御書題額恩敕批答〉拓本（肅宗敕書批答）。取自朱關田主編，《顏真卿書法全集（珍藏版）》，第5卷，頁239。

圖11 〈修梁吳興太守柳惲西亭記〉殘石碑陰。取自薛龍春，〈名稱、書寫及環境所塑造的風格——圍繞浙大藏顏真卿殘碑的三個問題〉，《中國書法》，2020年11期，頁133。

圖12 〈修梁吳興太守柳惲西亭記〉碑陽、碑陰拓本。取自薛龍春，〈名稱、書寫及環境所塑造的風格——圍繞浙大藏顏真卿殘碑的三個問題〉，頁130-131、134-13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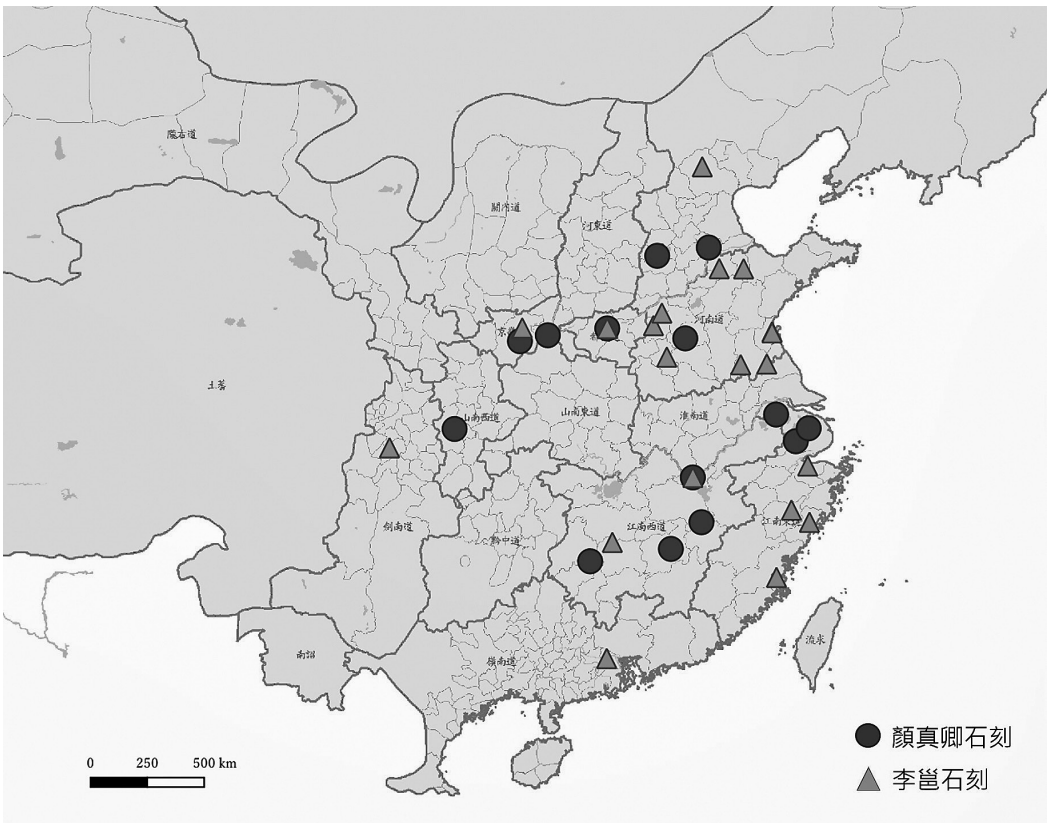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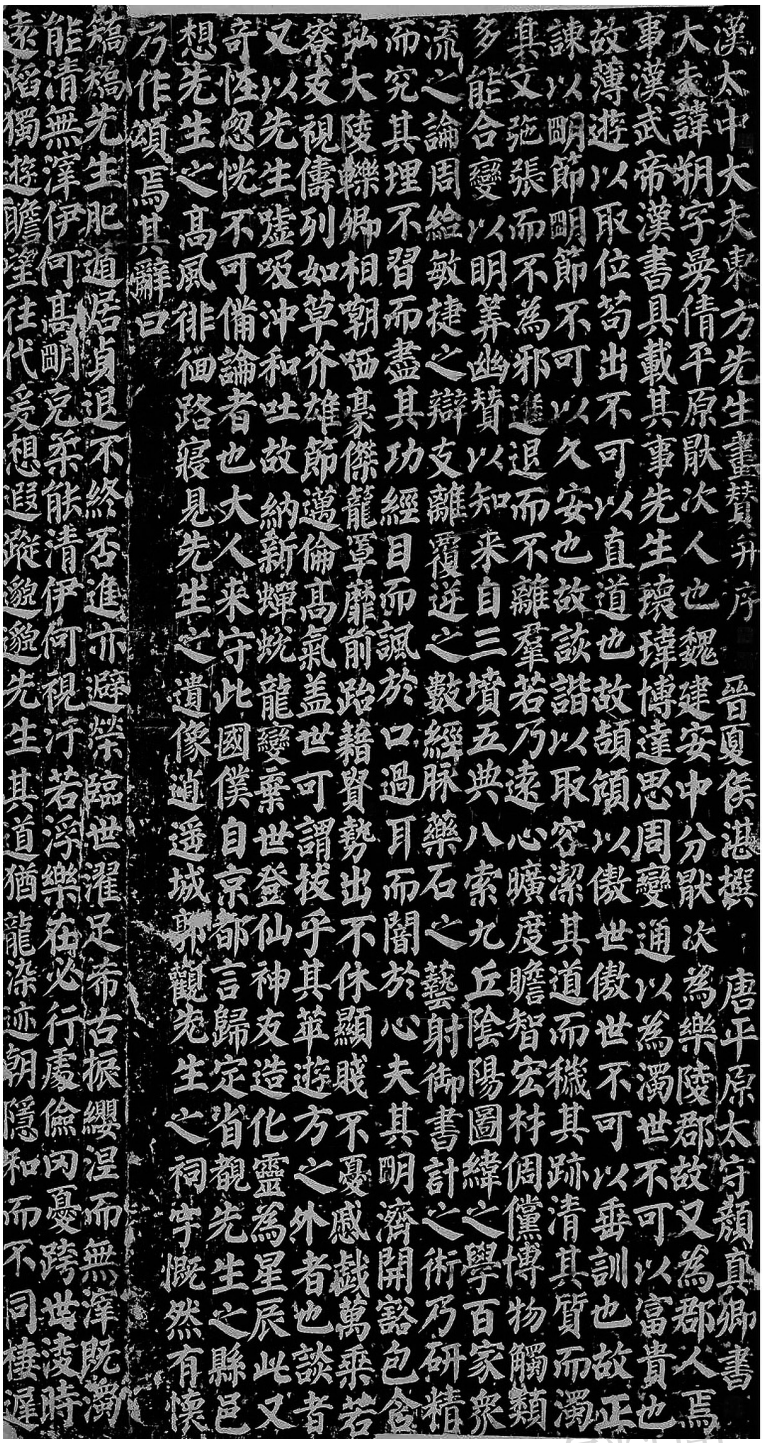


圖1　顏真卿現存石刻書迹分布（附李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漢太中大夫東方先生畫贊并序　晉夏侯湛撰　唐平原太守顏真卿書
大末譙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　魏建安中分厭次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
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爲濁世不可以富貴也
故薄遊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
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容潔其道而穢其跡清其質而濁
其文施張而不爲邪進退而不離羣若乃遠心曠度瞻智宏材倜儻博物觸類
多能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来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
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經脉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研精
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夫其明濟開豁包含
弘大陵轢卿相朝笑傑龍罩靡前跆籍賢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感戚萬乘若
窓戈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枝乎其華遊方之外者也談者
又以先生噓吸沖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世登仙神友造化靈爲星辰此又
奇怪忽恍不可備論者也大人来守此國僕自京都言歸定省覩先生之縣邑
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遹遥城郭觀宪生之祠宇慨然有慕
乃作頌焉其辭曰

嗨嗨先生肥遁居貞退不終否進亦避榮臨世濯足希古振纓涅而無淄既濯
能清無滓伊何高跡克柔能清伊何視汙若浮樂在必行處儉冈憂跨世凌時
素韜獨遼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遐蹤貌先生其道猶龍潛迹朝隱和而不同棲遲

圖2　〈東方朔畫贊並碑陰記〉民國拓本（局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3　〈華山廟題名〉拓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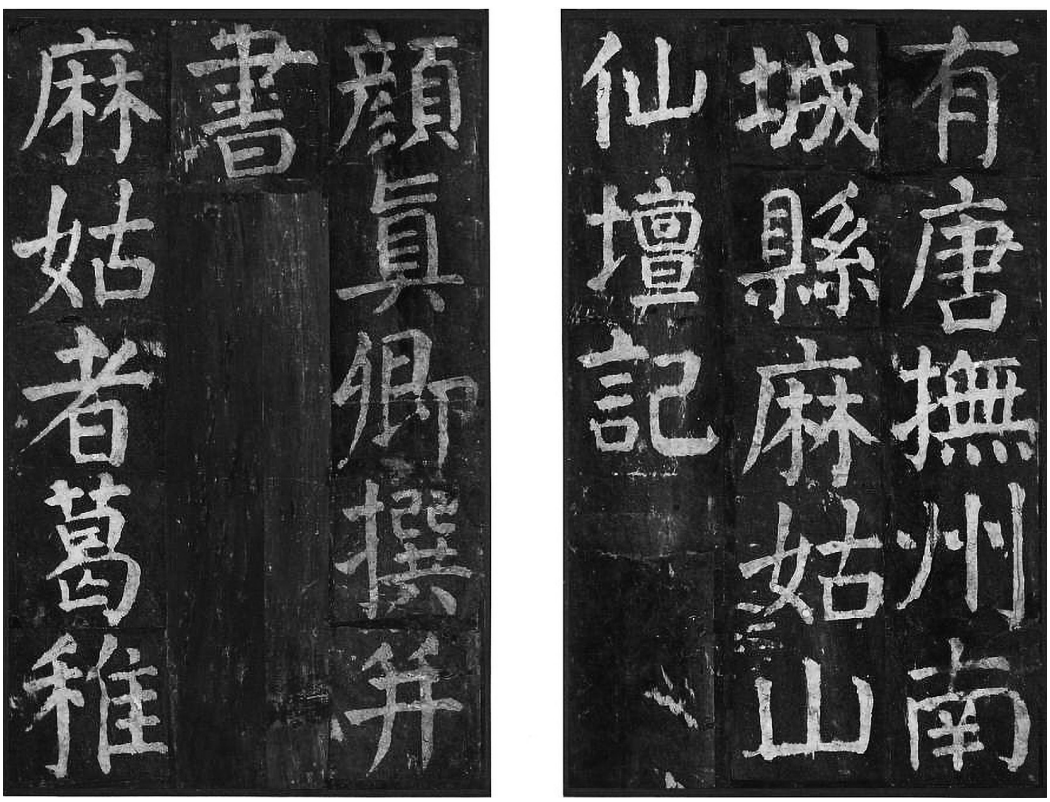


圖4 〈麻姑山仙壇記〉宋拓本（局部） 北京 故宮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5 〈大唐中興頌〉宋拓本（局部） 北京 故宮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6 〈八關齋功德記〉拓本（局部） 臺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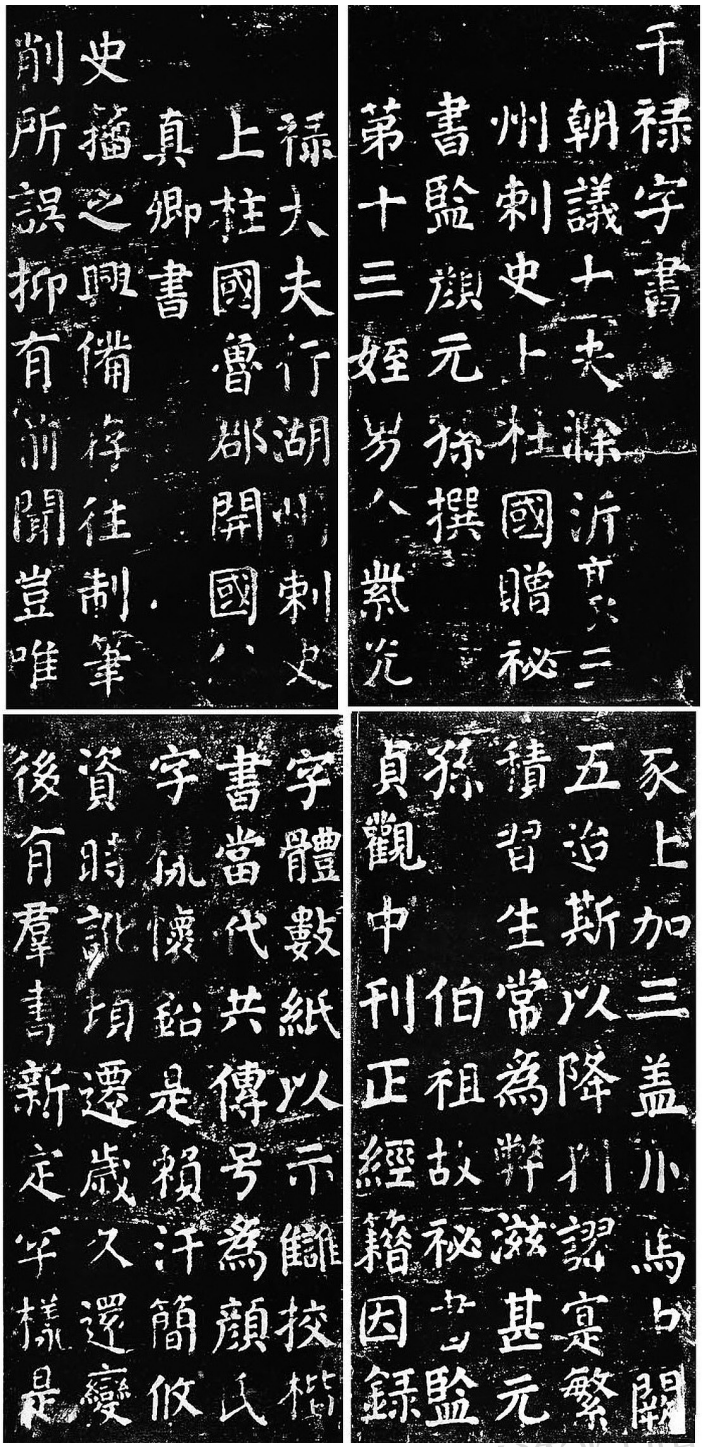


圖7　〈干祿字書〉拓本（局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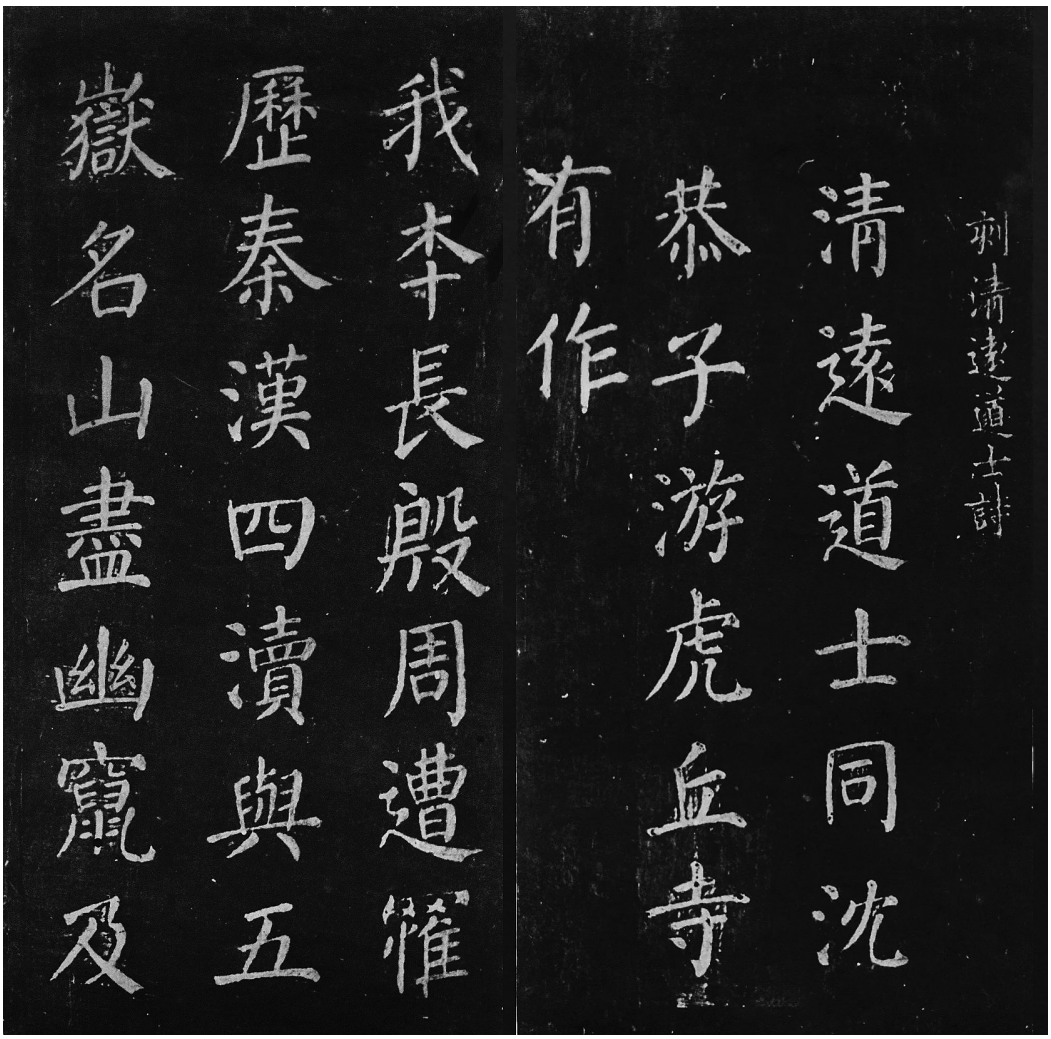


圖8 〈清遠道人遊虎丘詩〉拓本（局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9　〈乞御書天下放生池碑額表〉拓本（局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0 〈乞御書題額恩敕批答〉(肅宗敕書批答局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1　〈修梁吳興太守柳惲西亭記〉殘石碑陰　浙江　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2 〈修梁吳興太守柳惲西亭記〉碑陽（右）、碑陰（左）拓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Writing on Stone Wherever He Went: Yan Zhenqing's Stele Inscriptions Created during His Official Travels and Their Fate in the Tang Dynasty

Huang, Ting-shuo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Among the surviving calligraphic works of the Jin and Tang dynasties, Yan Zhenqing (709–785) has contributed both an unparalleled sheer number of pieces and a wide distribution of them. This was already noted in the Northern Song period when the epigraphers had observed Yan's fruitful creation in calligraphy art as well as stone inscriptions. Ouyang Xiu (1007–1072), for example, attributed the abundance of such works which included a great number of stone inscriptions to the calligrapher's ambition of spreading his works. Ouyang concluded that Yan's intention of creating artistic legacy had led to his use of "monumental inscriptions" or "engraving on cliffs" as a medium for wide spreading of his art. Building upon this observation, this study first argues that Yan Zhenqing's prolific output of stone inscriptions stems from his extensive and prolonged official travels when serving the government. During that time, Yan frequently received different commissions to inscribe, and he actively utilized stone as medium to create and preserve his calligraphy. Consequently, his stone inscriptions developed along with multiple contexts, showing significant expansion and innovation in subject matters, calligraphic expression, and production methods compared to earlier works. However, these numerous inscriptions faced severe threats soon after his death. Fortunately, a group of dedicated admirers and discerning individuals undertook efforts during the mid and late Tang to rescue and restore Yan's works and to pass down his legacy. This intervention allowed a substantial quantity of Yan Zhenqing's stone inscriptions to survive into the Northern Song and to the present day. Overall, this study asserts that Yan Zhenqing's creation of stone inscriptions during his official travels holds unique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stone engraving. The diverse methods he leveraged to create art offer an important point of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on stone inscriptions.

Keywords: Yan Zhenqing, stone inscriptions, official travel, history of stone engraving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